

狄更斯

生平、思想和创作

在英国近代文学史上，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是惟一可以和莎士比亚媲美的伟大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的高峰，狄更斯的小说则是十九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珍宝；英国人赞颂莎士比亚为“时代的灵魂”、“王冠上的明珠”，马克思、恩格斯称狄更斯是“时代的旗帜”、“出色的小说家”。狄更斯和莎士比亚一样，风靡英伦，誉满全球，是深受各国人民喜爱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所有讲英语的国家都熟悉狄更斯这个名字；家家户户都可以找到狄更斯的作品；他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像匹克威克、奥列佛·退斯特、大卫·科波菲尔、密考伯先生等等，在许多国家已经妇孺皆知，家喻户晓。

一八七〇年六月九日狄更斯逝世的消息传遍了世界，特别是传遍了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讲英语国家的每一个家庭，许多人不禁失声痛哭。当他的遗体在著名的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之角”安葬时，前来吊唁、瞻仰的人们络绎不绝。整个墓地摩肩接踵，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为失去一位可敬可爱的伟大作家而悲痛。据说伦敦有一个小贩的女孩这样吃惊地发问：“狄更斯先生死了吗？那么圣诞老人是不是也要死掉呢？”这个传说表明，狄更斯的名字多么深入人心，竟被人们拿来跟西方世界中善良、幸福的象征——圣诞老人相比拟。他的小说被译成世界各国的文字，并不断再版；他的作品正在制成录音带，改编为电影、戏剧和电视剧。一九〇二年由狄更斯迷、学者、教授、文学家和研究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专家发起组成了“狄更斯联谊会”，如今它的分会已遍及世界各地。在众多的学术论文和研究著作中间，还有《狄更斯辞典》和《狄更斯百科全书》。可见，狄更斯作为一个杰出的古典小说家的声誉，经久不衰，至今依然。

鞋油作坊留伤痕

查尔斯·狄更斯一八一二年二月七日生於英国南部朴茨茅斯市外的海港波特西地方。他的父亲约翰·狄更斯是海军军需办事处的职员。他工作勤奋，热情好客，性格爽朗，爱讲故事，却不善理财，薪金不多却要过绅士式的安逸、舒适的生活，结果弄得入不敷出，债台高筑。他和妻子总共生了八个孩子，查尔斯·狄更斯排行第二。小狄更斯长得非常漂亮，生着一对蔚蓝色的眼睛和卷曲的头发，又有异乎寻常的歌唱和朗诵才能。为此，他深受父亲的喜爱，经常带他出去旅行，给他讲述各种故事。一八一七至一八二二年间，全家迁居到查塔姆一所简朴的宅子里。在这里，狄更斯度过了美好的童年。

座落在罗彻斯特通往葛雷佛赛德大道旁边的盖茨山，曾给小狄更斯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里是莎士比亚戏剧中写到过的福斯泰夫爵士专门拦劫去坎特伯雷朝拜圣地的善男信女和来往客商的地方。福斯泰夫的故事使狄更斯听了非常神往。小狄更斯用十分欣羡的目光抬头看望座落在山上的那栋叫做盖茨山庄的漂亮住宅。后来他成为名作家以后，真的在盖茨山买下了新居，实现了童年时代的愿望。

在查塔姆，瘦小多病的狄更斯最初从母亲那里学到了一些英语的基本知识，后来还学了一点拉丁文，不久又和姐姐范妮去一所男女同校的学校走读。不过，真正成为狄更斯的老师、启发他的文学想象力的，却是家里楼上一个小房间里的许多文艺书籍。那里有十八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斯摩莱特的《兰登传》、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哥尔斯密的《威克菲尔牧师传》，以及法国作家拉萨日的《吉尔·布拉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中古阿拉伯的民间故事集《天方夜谭》，等等。这些小说和故事中的人物和事迹使狄更斯浮想联翩，他自己常常扮演着书中他所喜欢的角色。

这时的狄更斯贪婪地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许多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扮演小说中的人物，体察他们的种种感情，因此他从孩提时起就培养出两种才能。一种才能是使他从小就喜欢幻想，爱好文学创作。他曾以《妖怪的故事》中的一个故事为基础，写了一部悲剧《米斯纳，印度的苏丹》，尽管这完全是模仿性的习作，但在小朋友中却出了名，他成了一个了不起的“神童”。另一种是培养了他的朗诵、唱歌和讲故事的才能。他随口就能讲出一个故事，而且讲得引人入胜；他歌谣唱得特别好听，很受父亲赏识。为此，不管在家中还是外出做客，他常常被人高高举起，或站在椅子上或站在桌子上，对亲戚、朋友表演各种节目。这两种从童年时代就培养起来的才能，使狄更斯后来成为杰出的小说家和著名的朗诵艺术家。

在这段时间里，狄更斯还在爱好戏剧的表兄詹姆斯·拉默特的支持和带领下，去剧院观看了一些莎士比亚的戏剧演出，进一步增强了他爱好文艺的兴趣。他的父亲还经常带他乘坐海军军需处的游艇去航行，在曼特威河上航行着的船只启发了他对大海的联想。

一八二二年，狄更斯由于父亲的调任而随同全家到了首都伦敦，结束了他在查塔姆的欢乐的童年生活。到伦敦以后，家庭的经济情况更为恶化，负债越来越多。为了节省开支，全家只能在伦敦郊区坎登镇的贝赫姆街租了一套又小又简陋的房子。周围环境的肮脏，社会底层人民的穷困，使幼小的狄更斯开始对穷人的生活有了初步的了解。

不久，父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母亲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竟想开办一所女子学校来赚点钱。她在门上钉一块“狄更斯夫人学校”的铜牌，由小狄更斯挨户分送招生广告，历数这所学校的种种优点，可是始终没有一个人来报名上学。一八二四年，父亲终因无力还债而被逮捕，关进马夏西负债人监狱，狄更斯十分伤心，哭得两眼通红，眼泪汪汪地奔走于家庭和监狱之间。他要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到街上去采办生活必需品，还要典卖家里所剩无几的东西，又要抽空到监狱里去探望父亲。不久，家里的东西几乎变卖、典当一空，连他最喜欢的从查塔姆带来的诸如《兰登传》、《汤姆·琼斯》等等图书，也一本又一本地落入旧书商的手中。

家境的艰难，迫使狄更斯不得不离开学校，进入一所黑鞋油作坊去当童工。这家鞋油作坊座落在亨格福特旧码头左边的一所歪歪斜斜、快要倒塌的旧房子里。它的周围又脏又臭，里面在腐烂的地板上和楼梯上，在阴暗的地下室里，到处可以看见乱窜乱跑拖着长尾巴的灰老鼠。狄更斯的工作是给黑鞋油瓶子盖上封口，用细绳缚好，贴上商标。他衣衫襤

褴，穿着破围裙，整天和瓶子、纸张、细绳、剪刀和浆糊瓶子打交道，工资一星期只有六先令。同他一起在地下室工作的，都是一些缺乏教养、衣着破旧的穷孩子。过了一段时间，狄更斯结扎瓶子、包装和贴商标的工作变得那样敏捷、熟练。老板觉得他长得五官端正，技术熟练，就把他放在沿街一个玻璃橱窗里面做活动广告。街上的人们特别是孩子们都跑过来，一边吃着果酱面包，一边把他们的鼻子紧贴在玻璃上，津津有味地观看他的劳动。

狄更斯认为这次家庭破产、父亲入狱和他进鞋油作坊当童工，是他不应遭受的有失体面的沉重打击，是他一生中的奇耻大辱。他不高兴谈起这些，甚至隐瞒这些事实，直到后来他有了钱，出了名，成了中年人，他还继续做着恶梦，梦见自己又一次变成了皮鞋油作坊中的那个流浪儿。这段生活在狄更斯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消失的伤痕。但是，这段生活也使他从社会的底层了解到了贫民的苦难，使他对无依无靠的儿童和饥寒交迫的穷人充满了同情，对富人和上层阶级充满了厌恶与愤恨。

家境仍然每况愈下，连房租也付不出，狄更斯全家不得不搬进负债人监狱。因为在当时，负债人监狱是可以出租房间给犯人家属住的。狄更斯独自一人住在外面的，每逢星期日，他买一些吃的东西进监狱去和亲人团聚。

苦难的日子终于熬到了尽头，狄更斯的父亲依靠从一个亲戚那里继承到的一笔为数不多的遗产而还清了债，全家才结束了这段监狱生活。狄更斯也离开了这个使他终身感到屈辱的黑鞋油作坊，重新进学校求学。这时候，狄更斯还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可惜的是，他就读的威林顿学校的校长琼斯先生，是一个主张棍棒教育的又愚昧又野蛮的人。他一天到晚用一根手杖敲打着学生。狄更斯在这所学校里除了得到一些棍棒教育的生活体验外，在学识上收获很少。后来在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对萨伦学堂的克里古尔校长的精采描写，就有着这段生活的影子。

学习了两年多以后，家里又没有钱了，狄更斯只好再次停学，为糊口而奔忙。他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抄写员，还经常跑出去为事务所送信和传递消息。这差使使他走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看到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和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之后，他很快学会了速记，充当速记员。一八三四年，狄更斯应《记事晨报》之聘，充当记者，专门到法院、议会中去采访新闻。他的速记水平很高，既快又准，深受报社的赞赏；他生动的文笔和丰富的语言，使跟他共事的采访记者们感到惊叹。因此，每逢大臣或著名的政治家要作重要演说时，他们就派狄更斯去采访。

狄更斯在伦敦当记者时期，正逢一八三二年英国议会的改革时期。在这场风起云涌的议会改革斗争中，狄更斯看到了英国社会的真相和政治机构为有钱人服务的本质，进一步熟悉了伦敦中、下层各种人物的生活，也使他有机会了解了在政治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千百种黑暗、罪恶的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从而，丰富了生活，增长了知识，为他以后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社会经验，积累了不少有用的素材。

在进一步认识生活的同时，狄更斯仍旧不忘读书。他用自学的办法来充实自己，经常出入伦敦大英博物馆图书阅览室，孜孜不倦地钻研书

本，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

当了一段时间的记者以后，狄更斯开始获得比较优厚的薪金，摆脱了少年时代的贫困和屈辱生活，满怀雄心壮志，准备登上文坛。

初出茅庐震文坛

一八三二年某一天傍晚，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怀着恐惧的心情，战战兢兢地把一篇稿子偷偷塞进弗利特街一条漆黑的弄堂里的一家邮局的邮筒里，然后一直朝着威斯敏斯特教堂走去。快活和骄傲使得他泪眼模糊。为了不在大街上让人家看见自己的眼泪，他在教堂里足足呆了半个钟头。这个带着腼腆神情的青年，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大作家狄更斯。

一星期以后，青年狄更斯买了他投稿的那份杂志，高兴地看到自己的习作已经发表。这篇稿子标志着狄更斯正式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接着，他以“波兹”为笔名，又连续写了许多篇描写伦敦风土人情、城市风貌和各种人物的特写，分期发表在《记事晨报》上面。一八三六年二月七日，当他二十四岁生日那天，狄更斯把这些特写汇编成《波兹札记》出版了，年底又出版了第二集。《波兹札记》中的特写丰富多彩，内容有讽刺中小资产阶级的庸俗和趋炎附势的，有揭露议会、法院和慈善团体的黑暗与虚伪的，也有赞美当时的城市生活的；体裁有人物速写，有关于伦敦的市容、景色和风土人情的随笔，有农村生活的素描，也有短篇故事；风格有轻松的幽默，温和的讽刺，还有感伤主义的叹息。特写的题目也很吸引人，如《国会一瞥》、《公共马车》、《我们的教区》、《校长先生》、《街市之晨》等等。由于这些特写把城市的美丑、善恶、诗意的幻想，甚至把首都的浓雾、潮湿的神秘魅力等都一一描绘了出来，因而受到伦敦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这些成绩初步显露了狄更斯的写作才能，使他树立了做一个作家的信心，决心放弃记者工作，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一个当时已经很有名的通俗画家西摩先生看中了狄更斯的才能，向一家出版社推荐，建议由自己画滑稽连环画，而由狄更斯写文字说明。青年狄更斯不愿意就画作文，而要求由自己写文章广泛地描绘英国的风光和人物，由西摩先生根据作品的要求画插图。双方同意后，狄更斯写了关于匹克威克先生出外游历的文章，西摩先生根据作品校样画了一幅“匹克威克社”和它的创办人匹克威克先生的肖像：胖胖的身子，圆圆的肚皮；紧身裤和皮绑腿；一只手藏在燕尾服里，一只手在空中挥舞作演讲姿势，以及他那快活自在的神情，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从此，人们一看到那幅画像就知道是匹克威克先生，画像使匹克威克成为活跃在人们周围的真实的人。这就是狄更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1836—1837）。杂志刊载了几期以后，作者突然发现自己塑造的“堂吉诃德”还缺少一个侍从“桑丘·潘沙”，于是为匹克威克先生加进了一个仆人山姆·维勒，从而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第一期刊载《匹克威克外传》的杂志，只印了四百份，到了第十五期时，单单预定的已超过了四万份，该杂志很快就畅销全国。匹克威克和山姆·维勒变成了英国的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匹克威克的故事变成了街谈巷议的中心课题，

商人们纷纷借用匹克威克的名字作他们商品的商标，狄更斯也成了英国文坛的红人。

在《匹克威克外传》陆续发表、日益受到欢迎的日子里，狄更斯爱上了《记事晨报》出版人霍茄士的长女凯瑟琳。年轻人的热情冲动和过于性急，使他们没有顾到性格上、兴趣爱好上的差别，匆匆忙忙地在一八三六年四月二日结了婚。婚后却越来越发现两人性格上的巨大差异，他的夫人并不了解他，感情上和他合不拢，狄更斯痛苦地说：“凯瑟琳是温柔而和顺的，但要我们做夫妻却是异常的不相配。”和他性格、爱好相合的小姨玛丽·霍茄士，却又在他们结婚一年多以后突然患急病去世。狄更斯十分悲痛，有好几个星期提不起精神来写作，以致《匹克威克外传》的出版不得不延期。玛丽的形象以后成为《老古玩店》中的耐儿、《大卫·科波菲尔》中大卫的意中人——真诚、美丽、温柔的艾妮斯的原型。

《匹克威克外传》的成功，使不少报刊、出版社纷纷向狄更斯约稿，要他写小说分期连载。于是紧接着，狄更斯第二部长篇小说《奥列佛·退斯特》从一八三七年二月开始在《边特莱氏杂志》上连载。

《奥列佛·退斯特》成书于一八三八年，是作者早期创作中最重要的一部社会小说。狄更斯在这里第一次把读者带进了贫困与痛苦的世界，展现了社会底层的可怕的生活画面，并宣扬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幻想。

成了作家以后的狄更斯，精力充沛，朝气蓬勃，日夜不停地写作，却还赶不上外面的需要，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印刷工人跟在他后面等候要稿发排。

狄更斯保持着“夜游”的习惯。每到夜晚，不论刮风下雨，他总在伦敦街头漫步，观察首都街头巷尾的人群和五光十色的商店招牌和广告，细听人们的谈话，看到衣衫褴褛的人，就跟着他们穿过小巷进入下等公寓或旅馆了解他们的生活，事后把所见所闻和想到的一切记录下来作为素材。他用这样办法保持和底层社会的联系，不断从中汲取创作的养料，并广泛采集人们的口头语汇。

《奥列佛·退斯特》发表以后，狄更斯还写了《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9）、《老古玩店》（1841）和《巴纳比·拉奇》（1841）等三部长篇小说。其中《老古玩店》的成功，使狄更斯的声望更高了。

《老古玩店》描写的是，在伦敦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有一家衰败老朽的古玩店。白发苍苍的店主人吐伦特和死去了母亲的十四岁的外孙女耐儿一起相依度日。吐伦特由于把从高利贷暴发户奎尔普那里借来的钱在赌博中输得精光，阴险奸诈的奎尔普趁机吞并了老古玩店，还企图霸占耐儿，做自己的姨太太。可怜的老人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带着外孙女偷偷地离开了伦敦，过着颠沛流离、乞丐似的生活。他们时刻提心吊胆，担心奎尔普跟踪迫害。他们有时与木偶剧团、马戏班子、卖艺闯江湖的流浪艺人为伍；有时与从事蜡像巡回展览的乍莱太太结伴。他们经常露宿草棚，墙脚，饿得头昏眼花。一天，耐儿正拉着一辆马车乞讨的时候，突然晕倒在地，幸被车上一个心地善良的农村教师救起，被安置在一所乡村教堂里，才结束了流浪生涯。但是，身心备受损伤的耐儿终因疲劳过度，精力衰竭而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吐伦特老

头也心碎而死。

通过小耐儿之死，小说控诉了黑暗的社会对青少年的摧残和迫害。长相丑陋、心地狠毒的奎尔普，不仅从经济上逼得耐儿祖孙俩倾家荡产，被迫逃亡，而且他追踪的魔影时刻笼罩着她的心灵；她的流氓哥哥为了夺取吐伦特的财产，也指使一个无所事事的青年设法把耐儿骗娶到手；一些流浪艺人为了得到一笔赏金，也密谋出卖她和她的外公。人情的冷酷，环境的逼迫，终于吞噬了这个天真、善良、美丽的姑娘的生命。

作者深切地同情小耐儿，对她的美德和天真无邪竭力赞扬，为她的苦难、死亡而伤心、哭泣。这部小说是在狄更斯自己主编的《汉弗莱先生之钟》周刊上分期连载的，每一期一发表，立即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对小耐儿命运的关怀。不少读者写信要求作者笔下留情，保存耐儿的生命。狄更斯原先也打算像以前的几部小说那样，以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来收尾，但他的好友福斯特却建议他，让耐儿在年轻时代就死去，以便保持她那娇艳的处女的身心，认为这样也许会比大团圆的陈旧结局要深刻得多。狄更斯接受了这个建议，但精神上十分痛苦，拖了很久才不得不以耐儿之死结束这部著作。这个结局不但作者感到难过，社会上一些好心人也感到伤心。狄更斯的好友卡莱尔看了这个悲剧性的结局后，像孩子般地痛哭流涕；一位议员在火车上看到耐儿死了之后，啜泣着把书撕碎，并抛到窗外。

《老古玩店》除了揭露高利贷暴发户的凶狠以外，还讽刺了律师制造假证、栽赃陷害、司法界的腐败、黑暗和法官的胡审乱判，这些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小说以简朴刚健的笔触、丰富有趣的想象，特别是人物性格的鲜明而为人们所喜爱。

狄更斯早期创作的《匹克威克外传》等五部长篇小说，表明了狄更斯一开始创作就把描写现实生活、揭露社会丑恶作为自己写作的首要任务。但是这些揭露往往停留在现象上，而没有深入揭示出造成这些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狄更斯把好人受欺负的责任归咎于个别坏人或某些法律条文，几乎所有受难的善良人物，总会得到好心人的搭救，除了耐儿和她的外公以外，都是以皆大欢喜的大团圆作为结局。在创作的艺术手法上，他的早期作品深受两种古典文学——流浪汉小说和当时十分流行的情节剧的影响，善于抓住人物性格中的某一特点加以夸张，使性格突出，形象鲜明；幽默讽刺的手法运用得很熟练；悲怆、伤感的情调相当浓厚；结构上大小故事交叉，松散而逗人喜爱。这些特色给狄更斯带来了名作家的声誉。当然，狄更斯早期作品中对“好人”和“坏人”的划分过于分明，有简单化的倾向，受到不少评论家的责难。

访美归来话“天堂”

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的英国，处于宪章运动从发生、发展到衰落的历史时期。议会改革以后，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使工商业资产阶级大发横财，而无产阶级的贫困、失业、饥饿、疾病、死亡等灾难却恶性膨胀，独立自由的“人”则被折磨成动物一样的“人畜”。在这种情况下，劳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一八三七年，伦敦工人协会通过了一份递交给议会的请愿书，次年以“人民宪章”的名义公布，历

数人民群众的疾苦，提出了以成年男子应有普选权为中心的六点政治要求，数以百万计的劳动人民在宪章上签名。

这一汹涌澎湃、遍及整个英国的群众运动，以及运动过程中揭露出来的种种触目惊心的社会罪恶，不能不影响到狄更斯的思想 and 创作，从而使他对社会问题更加关切，观察更加细致、深刻。他非常同情工人的不幸和苦难，他在一封信中慨叹英国社会“苦难”的“深重”，“穷苦”的“猖獗”，并且说：“我清楚地了解到巨大改革的必要性。”他渴望社会有一个变革，并不断探索改变现状的途径。这时，大西洋对岸的新大陆美国，深深地吸引了他。狄更斯和十九世纪上半叶一些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人士一样，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新型的共和国。那里没有君主，没有封建制度，没有控制人们思想的国教，人人平等自由，是众人向往的人间“天堂”和“乐园”。狄更斯认为“新世界的英秀俊发”，一定会“纠正旧世界的欺诈和罪恶。”他还想在畅游美国回来之后写一部使英国人民喜爱的好书。这时候，狄更斯的名字已经誉满新大陆，特别是《老古玩店》中的耐儿之死，更使美国读者感动。据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矿工们夜晚曾在营火旁含着眼泪静听耐儿的故事；纽约码头上的群众看到进港的外国船，就对旅客高喊：“耐儿真的死了吗？”广大美国读者迫切希望《老古玩店》的作者能够来美国访问。于是，狄更斯在一八四二年一月三日离开英国海港利物浦，横渡大西洋。

一踏上美国波士顿码头，狄更斯就受到热心的美国读者的热烈欢迎。他收到的来信和请柬多到不得不雇请一个秘书来处理这些事情。在他住宿的房间里，挤满了来访的异国读者，甚至床上也坐满了人。他为自己的作品能在这块新大陆上获得如此强烈的反响而感到惊喜。

狄更斯在美国呆了四个多月，从波士顿南行，访问纽约、费城，进入蓄奴地区，经过巴尔的摩、华盛顿、匹兹堡、圣路易斯等城市，参观了中西部大草原和世界闻名的尼亚格拉大瀑布，最后由纽约乘船回国。归国后写出了特写集《美国札记》和长篇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

《美国札记》（1842）真实地记录了狄更斯在美国的见闻，反映了他对美国这个民主、自由的人间“天堂”由充满幻想到大失所望的思想过程。

美国《独立宣言》中“人生而平等”、人人有“生存、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等名言，曾使狄更斯充满了对美国的憧憬，但一踏上新大陆，就发现这种民主、自由是虚幻的。集中体现民主精神的美国国会，竟是一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扼杀民主、摧残人权的政治机构。

最使狄更斯痛恨的是美国的奴隶制度。他到南方去，在所乘的火车上，见到黑人只能坐简陋的车厢。就在这种车厢里，他亲眼看到一个黑人妇女，带着几个孩子一路啼哭。原来他们是刚从奴隶市场被人买下来的，而她的丈夫却仍然留在原先的旧主人那里；买主坐在白人车厢里，每到一站都要跑去监视，生怕他们逃走。狄更斯从报纸上看到许多悬赏找寻逃亡黑奴的通告，更使他进一步了解了奴隶制度的残酷。那些完全有权利和白人一样生活的黑人，有的只剩一只耳朵，有的被砸掉几颗牙齿，有的身上带着烙铁烫过的烙印，有的留着鞭打、刀戳的伤痕，有的缺腿、断臂。他还了解到某些城市里，在光天化日之下竟可以当众把黑人活活烧死，而那里的法官、律师、政府官吏却熟视无睹。在首都华盛

顿，居然有一条明目张胆虐待黑人的法律：任何治安官吏有权在大街上逮捕任何黑人，只要他们认为这个黑人是逃亡的奴隶，而不要什么人证、物证。对以上种种丑恶现象，狄更斯义愤填膺，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但狄更斯只是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呼吁有理智的人主持公道，用道义力量制止这种残杀、迫害黑人的野蛮行径，而不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残酷的奴隶制度。

狄更斯的《美国札记》出版后，受到美国不少报刊的诋毁和谩骂。纽约《先驱报》攻击狄更斯是“最浅薄、最幼稚、最没有价值、最可鄙视的人”。当时纽约有一家戏院正在上演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这个戏里有这样一个镜头：女巫们围绕燃烧着的巫锅载歌载舞，同时把蛇皮，蝎爪之类的秽物投到锅里。演员们异想天开，在围锅跳舞的时候，竟把狄更斯的小说一并丢入，当众焚毁。美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诽谤运动，进一步激发了狄更斯的创作热情。紧接着《美国札记》之后，狄更斯又写出了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

《马丁·朱述尔维特》（1843）通过青年主人公马丁·朱述尔维特在美国游历时的见闻，进一步展开由《美国札记》开始的对美国社会的揭露。小说揭示出，在美国金钱崇拜高于一切的真相，指出那里的人们所有的兴趣、希望、快乐、感情和道德，似乎都融解成一块块的金钱。但小说意外地遭到了冷遇，按月刊载这部小说的杂志的销售数，由《老古玩店》的七万份下降到两万份。

当《马丁·朱述尔维特》的写作即将结束时，狄更斯又着手创作一组《圣诞故事集》（1843—1848），包括《圣诞欢歌》、《灶边蟋蟀》、《生命的战斗》和《着魔的人》等。

这组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圣诞欢歌》。它描写一个吝啬、贪财的商人史克罗奇，他冷酷、自私、一毛不拔，连圣诞节的庆祝活动也被他斥为“胡闹”。圣诞前夕，他原先的合伙人马莱的鬼魂来找他，并替他找来了“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圣诞节鬼魂”；带他去看他自己童年时代曾经怎样友爱、欢乐，现在怎样被利欲弄得灭绝人性，将来又将怎样落得悲惨死去的下场。他终于受到了良心的谴责，觉悟到把生命浪费在积聚钱财上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他热情地对人们讲“圣诞快乐”，他隐匿了姓名，把火鸡送给穷人，捐款给慈善机构，给职工增加薪水，变成“一个好朋友、好东家、好男人，好到不能再好”的慈善家。

这篇小说和《圣诞故事集》中的其他故事一样，集中反映了狄更斯的人道主义、博爱观点。它真实地描写了广大人民的困苦生活，鞭挞了除了钱柜、帐簿和发票以外没有任何人的感情的资产者。但小说竭力宣扬了所谓“圣诞节精神”，即人与人之间要互相信任、互相爱护，要使人间充满欢乐、友爱和幸福。希望圣诞节的钟声唤醒富人的良心，要他们像善良、仁慈的圣诞老人那样关心穷人，慷慨而不吝啬，仁爱而不凶残，行善而不作恶。小说渲染了宁静、舒适的节日气氛：一家人和至亲好友围着壁炉快活地聊天，品尝美味的饮料，饱啖丰盛的菜肴，在严冬的风雪中造成一派诗情画意的牧歌情调。这些，反映了作者因《马丁·朱述尔维特》受到冷遇后逃避现实、缓和矛盾的思想情绪。

《圣诞故事集》流传较广，但没有获得狄更斯预期的经济上的成功。

他为了减少相当庞大的生活开支，也为了休养身心，他决定旅居国外，先在意大利（1844—1845），后来又到瑞士和法国（1846—1847）。在巴黎，狄更斯参观了著名的卢浮宫美术馆、凡尔赛宫、巴士底监狱遗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皇家广场的一所很漂亮的房子里，狄更斯跟法国著名小说家维克多·雨果曾经会见过。这两位文化巨人对许多社会问题有着共同的认识和一致的态度，这些在狄更斯的《奥列佛·退斯特》和雨果的《悲惨世界》里都表现出来。例如，他们对社会黑暗的抨击，对穷人悲惨生活的同情，对善良、仁爱的赞美，对凶残、邪恶的憎恨，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宣扬等等，都促使两人之间有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友谊。

在旅居巴黎期间，狄更斯开始写作长篇小说《董贝父子》（1848）。伦敦大商行董贝父公司的老板董贝先生，为人傲慢，有着铁石般的心肠。他用“金钱可以买到一切”的思想教育儿子，希望儿子成为自己事业的继承人。他的女儿因不能继承父业而受到父亲的冷遇和歧视。儿子夭亡后，他借金钱势力续娶了美丽的贵族少妇爱狄丝，想再生一个继承人。后妻因不堪忍受他的冷酷，便和他的助手私奔了。董贝深受刺激，公司也在商业竞争中宣告破产。他孤苦伶仃，深感绝望，决心自杀。幸亏被董贝驱逐的女儿艾洛伦丝带着周岁的儿子回到伦敦，并主动向父亲表示挚爱，使父女和解，生活在一起了。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成功地塑造了董贝这个资本家的形象。通过这个人物，讽刺了有产者傲慢自大、冷酷无情、惟金钱是图的丑态，最后他落得经济破产、生活孤苦、举目无亲的下场。尽管小说仍然拖上一条大团圆的光明尾巴，但它对资产者的丑恶本质的揭露，仍然是非常突出的。小说还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后社会生活的变化，如铁路的发达，城镇面貌的改变等等。

《董贝父子》出版后获得了成功，狄更斯重新定居伦敦，满怀信心地准备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

根深叶茂硕果累

丑六十年代是狄更斯思想成熟、创作丰收的年代。那些思想性、艺术性高度统一的几部小说，如《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双城记》、《伟大的期望》、《我们共同的朋友》等，都发表在这一时期。这段时间内，狄更斯还先后创办了《家常话》、《一年四季》等刊物。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经济进入空前繁荣时期，工业生产占世界第一位，有“世界工厂”之称。当时，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已取得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阻止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发展，政府容许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修改了部分明显压迫人民的法律条文。但是经济的繁荣并没有使工人群众的生活相应地得到改善，反而使贫富悬殊的现象更加严重，贫民人数急剧增加，工人劳动条件十分恶劣，伤亡事故屡见不鲜，迫使工人走上了斗争的道路。

狄更斯的思想在这段时间内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他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不是某个坏人的恶劣品质造成的，而是植根于整个社会制度。他感叹政府官吏和国会议员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的利益打算。狄更斯愤慨地说：“我们的政治、贵族统治和我们的趋炎附势、结交权贵之风将致英国于死命”，“代议制政府在我们这里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他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创作上，就是使作品对资产阶级的政府、议会、法院、法律、监狱、伦理道德、劳资关系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揭露批判，风格上也由乐观幽默转为严肃阴沉。

一八五〇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是狄更斯的重要作品之一。这部小说不仅保留了前期创作中那种乐观和幽默的风格，后期创作中那种严肃、阴沉的情调也开始出现，但还不十分明显。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和故事，都是根据狄更斯个人的经历或者是自己生活中熟悉的人物和故事写成的。例如大卫·科波菲尔最初读书的那个实行棍棒教育的萨伦学堂，他在伦敦摩·格公司所过的沈瓶子、贴商标的童工生活，他旅行欧洲大陆和成为名作家的经历，大卫娶的那个美丽、天真而不善理家的妻子朵拉等等，都和狄更斯的经历相似。小说中其他人物如密考伯先生，正是狄更斯父亲的写照。当然，大卫·科波菲尔不等于狄更斯，有些经历就完全不同，例如大卫的父母双亡，狄更斯则双亲健在；大卫的妻子朵拉很早夭亡，狄更斯则和妻子凯瑟琳分居等等。狄更斯和大卫的性格也有差异。狄更斯既有性情温和、善良、宽厚的一面，也有粗暴、无情的一面；而大卫·科波菲尔则完全是温文尔雅、善良和蔼的。因此，小说不完全是自传。它只是采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以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的成长过程作为中心线索，反映了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代的社会生活。

《大卫·科波菲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很快被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从此以后，狄更斯不仅是英国一位大作家，而且成了当时英国惟一被人们崇拜的偶像，成为名传欧、美两大洲的杰出小说家。一些原先瞧不起狄更斯的上层社会的绅士、淑女们，现在看到他有名、有钱、有地位了，纷纷邀请他参加他们的宴会、舞会和社交活动，以显示他们懂得诗文、尊重人才。作为社会底层人民代言人的狄更斯，仍然保持着

为人洒脱、善于戏谑、不奉承权贵的作风，而且往往故意挖苦、嘲弄那些老爷、太太们。有一次，他应邀参加上流社会的一个舞会。那些穿戴华丽、举止文雅、雍容华贵的绅士、淑女们聚集一堂，等候狄更斯的到来。可是狄更斯却穿着一身普通服装走了进来，和大家点头招呼后坐下不久，他却出人意料地唱起讨饭歌来了。那些高贵的宾客听了眉头紧锁，他却越唱越高兴。狄更斯的这个玩笑，使老爷、太太们十分尴尬，使这次豪华盛大的舞会大煞风景。

成为名作家以后的狄更斯并没有心满意足，“如果我吝惜我自己，我就要生锈、分裂和死亡”。他下定决心，用更多更好的作品继续对社会问题、对人间弊病进行尖锐的批判和鞭挞。

一八五三年，又一部长篇小说《荒凉山庄》问世了。这是一部集中抨击司法制度的腐败和贵族的昏庸没落的小说。

贾迪斯家的后代为继承遗产争执不休，告到专门承办遗产、契约纠纷的大法官庭。官司打了好几代人，仍然得不到解决。目前遗产案涉及的继承人主要有约翰·贾迪斯和受他监护的一对年轻人理查德和炯达。他们居住在荒凉山庄，等待大法官庭的宣判。后来，理查德在一堆废纸里找到了一份遗嘱，拖了几十年的贾迪斯案终于结案宣判了。然而全部遗产已被诉讼费消耗一空，理查德虽然成了继承人，却分文未曾到手，一气之下，口吐鲜血而死。

与贾迪斯案件有牵连的德洛克夫人，从律师图金霍恩手里看到一份诉讼文件的抄本，从中认出了过去情人的笔迹。她通过一个扫街的穷孩子找到了刚刚死去的情人的墓地，后来还找到了自己的私生女埃丝特。她得知有人要利用这个秘密对自己进行敲诈、要挟，感到她的隐私必然会暴露，为了避免当众受辱，便深夜出走，倒毙在原先的情人墓前。

通过贾迪斯案的实例，作者愤怒地揭露了以大法官庭为代表的英国司法制度和烦琐的法律程序的腐朽性和危害性。小说中凡是与这一案件有牵连的人，都像沾染了瘟疫一样不得善终。老一代的托姆·贾迪斯为了等这一笔遗产而毁了自己的一生，最后在绝望中自杀；新一代的理查德也因为一心指望从判决中得到遗产而耗尽心血和钱财，最终丧命。其他有关的人也是在无望的等待中，不是丧生就是发疯，都遭到悲惨的下场。那些法官、律师、社会寄生虫却都靠此案发了财，升了官。审理这一案件所写的“起诉书、反起诉书、答辩书、二次答辩书、禁令、宣誓书”等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法律文件，“简直成了死亡统计表”。

在这部小说里，狄更斯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整个司法机关和法律制度。作品通过一个人物之口发出了“大法官庭真是个人间地狱”的咒语。为了突出这个主题，狄更斯特地描写了一个靠近大法官庭的废品回收商店。这个专门收购大法官庭的废纸和发霉的法律文件的商店，到处散发着腐臭，成了大法官庭的缩影，人们也戏谑地称它为“大法官庭”；而商店的老板——一个令人作呕的老怪物，也被人起了一个讽刺性的绰号——“大法官”。最后，废品商店发生“自动燃烧”，把这个“大法官庭”和“大法官”烧成灰烬，预示着现实的大法官庭和大法官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

《荒凉山庄》通过对德洛克夫人和她的丈夫德洛克爵士的描写，揭露了贵族阶级的腐朽没落，指出了这些贵族人物生活糜烂、心灵空虚、

思想僵化、陶醉于家族的煊赫历史而看不到时代的发展，从而揭示出这些寄生虫必然灭亡的命运。

小说采用了象征手法，一开始就描写伦敦的浓雾覆盖着一切，用浓雾象征英国的乌烟瘴气和窒息人性的现实社会，象征黑暗堡垒——大法官庭遮住了光明。狄更斯还给《荒凉山庄》抹上了严肃、深沉和灰暗的色彩，毫不妥协地揭露和讽刺了英国司法界、政界的阴暗面。

紧接着《荒凉山庄》发表的长篇小说《艰难时世》（1854），是一部以劳资矛盾为主要内容的重要作品。宪章运动在四十年代末遭到镇压以后，资产阶级肆无忌惮地压榨工人，使劳资矛盾更趋尖锐，罢工仍然不断。狄更斯在五十年代初曾去普莱斯顿了解工人罢工情况。他亲眼看到劳资矛盾的尖锐性和严重性，并意识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只顾赚钱，不管工人死活。狄更斯决心写一部小说来反映劳资矛盾问题，特别是要抨击替资产阶级的剥削进行辩护的功利主义理论。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谈到写作《艰难时世》的意图：“我的讽刺是针对除了数字和事实，其他什么都看不见的人的，是针对那些最卑鄙、最可怕的罪恶的代表人物的。”

小说以一个虚构的，但具有工业中心城市特点的焦煤镇为背景。这里，从高耸的烟囱中发出无穷无尽的浓烟；蒸汽机发出的声音震得人们头昏目眩。控制着焦煤镇每个居民的命运的，是国会议员兼教育家葛擂硬和纺织厂厂主庞得贝。他们都信守只讲实利、不讲信义的功利主义生活原则。葛擂硬把年轻的女儿嫁给老头庞得贝，使她受尽痛苦。在他的功利主义理论的教育下，儿子成了盗窃犯。庞得贝吹嘘自己劳动起家，诬蔑工人想过奢侈生活，因而有不满情绪。在收买工人斯梯芬失败后，又污蔑斯梯芬盗窃公款，造成这个善良工人的死亡。

葛擂硬是一个十足的功利主义学派的信徒。这个学派认为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基础，凡是有利于资产者的，就是有利于全社会。因此，葛擂硬自称是一个“专讲实际的人”。他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秤一秤，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他认为万事万物归根结底是“一个数字问题，简单的算术问题”，必须用“事实”——人生的现金买卖关系来待人接物和教育子女。葛擂硬认为感情、幻想、侠义行为、仁爱精神、娱乐、爱好等与“事实”无关的东西，全应抛弃。于是，他把孩子关在牢房似的教室里，不许看童话、不准唱歌跳舞，而要他们用一连串的数字、概念、科学标本充塞头脑，结果把孩子培养成为只讲个人利益的市侩。在这种“事实”哲学的支配下，他可以葬送二十岁的女儿露易莎的青春、幸福，要她嫁给五十岁的老头子庞得贝。因为他认为爱情、兴趣、爱好在“事实”面前都是不必要的。结果使得露易莎没有欢乐，没有爱情，精神空虚，差一点被诱骗失身，最后变得疯疯癫癫，精神失常。葛擂硬的儿子汤姆过惯了牢笼式的生活，一旦走上社会，生活就放荡起来，赌博输钱后就去银行行窃。当盗窃被揭穿后，汤姆也引证父亲的“事实”哲学来为自己辩护，断言根据统计学，社会上永远有一定百分比的罪犯，而他就是其中之一。女儿发了疯，儿子做了贼，这是对葛擂硬的功利主义哲学的辛辣讽刺。

庞得贝既是工业家，又是银行家、商业家。他在功利主义“自由竞争”的口号下残酷地剥削工人。在他眼里，工人没有爱情和喜悦，只是

一种没有灵魂的、给他带来金钱利益的“许多匹马的马力”。工人最起码的生活要求也被他看作是奢望，是“希望坐六匹马的车子，用金汤匙喝甲鱼汤吃鹿肉”。他捏造了自己在“阴沟里长大”、“艰苦创业”的谎言来掩盖其剥削行为。他肆意挑拨工人之间的关系，一看到工人斯梯芬不肯参加工会，就千方百计拉拢、收买，一旦遭到拒绝，不仅把斯梯芬开除，而且还污蔑他偷窃银行款子，使之含冤而死。作者对于庞得贝的狂妄、狡猾、冷酷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讽刺，对于斯梯芬的悲惨遭遇满怀同情。

但是，狄更斯在作品中揭露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哲学和劳资矛盾的目的，只是为了摆出社会的矛盾，使统治阶级注意、警惕，设法加以纠正。在小说中，他半是警告、半是恫吓地对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说：“在你们周围，穷人永远是存在的。趁着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最好在你们心中培养起想象和感情的最大美德，把他们那种需要装饰的生活装饰起来，要不然，……现实就会像豺狼一般地把你们吞了下去。”基于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狄更斯同情和赞美勤劳、善良而又主张劳资合作的工人斯梯芬，而对宣传暴力斗争的工人运动领导人斯拉克布瑞其竭力加以丑化，把他描绘成一个夸夸其谈、煽动工人走入歧途的政客式人物。

《艰难时世》在艺术上大量采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使用富于性格特征的语言来讽刺、勾勒葛擂硬、庞得贝的形象。葛擂硬一登场，他的外貌就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有一个光溜溜的脑袋；头发竖立在他那秃头的边缘，好像一排枞树，挡住了风；他的额头是四四方方，肩膀四四方方，连食指也是方形的。这些外形特征突出了葛擂硬的古板和专横，一看就令人厌恶。小说浓重的夹叙夹议手法，有的地方用得很好，加深了主题，突出了人物性格，但有些议论过于烦琐，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小杜丽》（1857）是狄更斯继《荒凉山庄》以后对英国司法制度和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深入批判的作品。女主人公爱弥又叫小杜丽，出生在马夏西债务人监狱。她对长年累月被拘禁在监狱里的父亲竭尽孝道，努力减轻他的痛苦。她爱上了一个男子亚瑟·克伦南姆。后来，一个意外的机会使小杜丽的父亲变成了一笔巨额财产的继承人，一跃而为富翁，出了狱。从此，一家人除了小杜丽以外，都变得傲慢、自私、盛气凌人，而克伦南姆却因投资不当被关进债务人监狱。小杜丽仍然到狱中来探望他，体贴他、关心他、照顾他，使他在贫病交迫中仍旧感到温暖。最后，克伦南姆还债出了狱，而杜丽一家却又破了产，使克伦南姆和小杜丽有可能结成终身伴侣。

小说围绕着小杜丽的父亲和情人失后因负债入狱的情节，揭露了“繁文缛礼局”——英国政府机关的官僚制度和一帮既不称职又碍事的官吏们对人民的危害，指责把持这些机关的几个家族像蚂蝗一样吸吮着人民的鲜血；揭示出债务人监狱中的黑暗内幕和穷人的苦难生活；抨击了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可耻与残暴。同时，作者赞扬了小杜丽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历尽千辛万苦的善良、朴实和自我牺牲精神。小说和《荒凉山庄》一样，采用了象征手法，监狱的阴影笼罩全书，暗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就是一座不见阳光、没有欢乐的大监狱。

《小杜丽》问世的后一年，即一八五八年，狄更斯生活中发生了一

件大事。他终于和结婚二十二年、并生了十个孩子的妻子凯瑟琳分居了，摆脱了家庭生活的痛苦。长子和他的母亲住在伦敦，其他子女则跟狄更斯一起居住在刚购置的盖茨山上的新居里。狄更斯把盖茨山的新宅作了精心的布置，他恢复了生活的乐趣。在除夕之夜，他兴致勃勃地站在门口，手里拿着表，孩子们环绕在他周围，一听到传来了教堂的新年钟声，他兴奋地叫道：“大家新年快乐！上帝保佑我们！”于是大家轮流接吻，祝福，握手，出现了一个迷人的闪耀着匹克威克精神的动人场面。

一八五九年，发表了狄更斯后期创作中最著名的小说《双城记》。作品以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后的英、法两国社会生活为背景，具体地描写了封建贵族生活上的豪华奢侈，政治上的滥施淫威，经济上的残酷压榨，真实地展现了城市贫民和广大农民啼饥号寒的悲惨图景。小说写出了由于阶级的尖锐对立所引起的暴力革命。同时，还反映了革命爆发后，下层平民狂热地镇压贵族所造成的“恐怖”、“混乱”情景。通过这些描写，狄更斯警告英国统治者要从中吸取教训，收敛淫威，纠正弊端，减轻剥削，实行社会改良，以缓和矛盾，避免法国暴力革命的重演。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出作者已经改变了对“维多利亚盛世”的乐观幻想，转而对英国前途表示担心。

狄更斯对英国社会的失望情绪，在一八六一年发表的《伟大的期望》（一译《远大前程》）中得到更加鲜明的反映。在狄更斯前期的小说中，出于善战胜恶的抽象的道德说教，出于对社会的乐观幻想，作品中出现的一些孤儿、穷人、受难者，经常意外地得到援助，从而摆脱了穷困，得到了幸福。大卫·科波菲尔碰到了好心肠的姨婆；奥列佛·退斯特受到善良的资产者布龙洛的收养，一下子就从社会底层登上了上流社会，成为“上等人”。到了五六十年代，随着狄更斯对社会认识的加深，毅然抛弃了这种廉价的乐观主义结局。《伟大的期望》这部小说的书名就带有讽刺意味，它真实地揭示出，在阶级鸿沟很深的社会里，穷人要想变成“上等人”，那完全是一种梦想。小说主人公匹普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明证。

匹普从小父母双亡，靠做铁匠的姐夫抚养长大。匹普小时候曾在沼泽地掩护过一个逃犯。后来，他被叫到一个富有而神经受过刺激的老小姐郝薇香家里，给这个百无聊赖的老处女消愁解闷。在那里，匹普一见钟情地爱上了郝薇香的养女、美丽而又骄傲的艾丝黛拉。他为了得到她的爱情，一心想做“上等人”，可是生活却只能让他当铁匠姐夫的学徒。有一天，律师贾格斯突然来到铁匠铺，说是受一个不肯泄露姓名的富翁的委托，要把匹普送到伦敦去接受“上等人”的教育。匹普喜出望外，误认为这是郝薇香小姐有意栽培他，认为自己的“伟大的期望”有可能变为现实。他在伦敦接受“上等人”教育的时候，经常和艾丝黛拉来往。艾丝黛拉却对他态度暧昧，冷热无常，把他弄得神魂颠倒，十分痛苦。一天深夜，一个不速之客——匹普童年时掩护过的那个逃犯马格维契突然来访，声称在国外发了财，为了报恩，暗中出钱要贾格斯律师把匹普培养成“上等人”。这个消息反而使匹普大失所望。不久，这个逃犯因属私自潜回国内，触犯刑律，重新被捕判刑。原来艾丝黛拉对匹普的挑逗是郝薇香唆使的，原因是郝薇香在新婚之夜被情人抛弃，现在要让养女代替她在男人身上报复。在使匹普受尽精神折磨之后，郝薇香又把文丝

黛拉嫁给了一个“畜牲不如”的二流子，这更使匹普精神上备受刺激。这样，匹普做“上等人”的幻想全部破灭，负债累累，气得生了一场大病，幸而在姐夫铁匠的帮助下，才还清了债务。后来，他在一个朋友的支持下到埃及的开罗谋生。十一年后，匹普回国探望姐夫。在已死去的郝薇香的庄园里，偶然碰见婚后备受摧残、已经成为寡妇的艾丝黛拉。两个饱经沧桑的情人，在互道“我们言归于好”声中离开了这个吞噬他们两人幸福的废墟。

匹普的经历说明了在当时的英国，劳动人民要想挤进上流社会，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针对匹普那种想当“上等人”的思想，作者通过铁匠的嘴告诫匹普说：“如果你不能顺着正路做到不平凡，可千万不能为了做到不平凡而去走歪门邪道！”作者还用铁匠和他的后妻毕蒂之间幸福生活的描写，进一步衬托出匹普所抱的“伟大的期望”是不切实际的。

《伟大的期望》和《双城记》一样，以结构严谨著称。作品紧紧抓住匹普想当“上等人”、最后又跌下来这条中心线索展开故事情节，丝毫没有同主线游离的趣人趣事或新闻轶事，而且登场人物相互之间又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些人物又是以互相对比的形式出现的。匹普童年时掩护过的逃犯马格维契，竟是珠光宝气的上流社会中的交际明星艾丝黛拉的父亲。丑陋、贫困的逃犯跟美丽、富有的小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婚之夜把郝薇香小姐抛弃的就是教唆马格维契犯罪的坏蛋康佩生；匹普对艾丝黛拉忠贞不渝的爱情，跟艾丝黛拉玩弄男性又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这种手法使小说显得瑰丽多姿，富有戏剧色彩，增加了艺术感染力。

小说对郝薇香小姐变态心理的描写很有特色。除了写她利用艾丝黛拉挑逗男人、向男人泄恨以外，还写到她一些常人少有的怪癖。她怕见阳光，说阳光是她的冤家对头，因此她的房间里门窗紧闭，白天也要点着蜡烛；她几十年如一日，总是头戴新娘戴的花朵，手上戴着新娘戴的亮晶晶的珠宝首饰；她浑身素白，头上披下来的长长的面纱是白的，鞋子也是白的，而每一件当年原是白色的东西，如今都已变成黄色了；她的手表和壁上的挂钟永远是晚上八点四十分，正是新婚之夜她接到情人遗弃她的信的时间。这些不同一般的艺术手法，标志着狄更斯的艺术随着思想的成熟而更加多样，更加丰富。

狄更斯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是《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被父亲驱逐在外的约翰·哈尔蒙，在父亲死后回到英国等待接受遗产。按遗嘱规定，他要跟一个他不认识的女子蓓拉结婚。哈尔蒙为了要了解未婚妻的为人，因而将他回国的消息秘而不宣。他化名充当秘书，暗中查访，了解到蓓拉的为人以后，才宣布身分，缔结良缘。小说揭露了金钱和优裕的生活对人性的危害；揭示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道德的堕落；并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保守、自大、麻木不仁的资产者薄德史奈普的形象。作家还用散发着臭气的垃圾堆象征着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同样反映了狄更斯对英国社会的失望和愤懑心情。

能诵善演惊欧美

狄更斯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而且还是闻名欧美的善于朗诵的

表演艺术家。

狄更斯从小就有讲故事、唱歌谣、演节目的才能，常常扮演戏中的某个角色。青年时代他曾打算在修道院的花园剧院谋一个位置，当了作家以后，狄更斯也一直爱好戏剧，喜欢参加业余演出。晚上，他经常组织猜谜游戏和演出哑剧；平时在家里，也常为孩子们作魔术表演。狄更斯常说，如果他能够表演别人的性格，即使是游戏，他也感到轻松愉快。

四十年代末，当狄更斯从欧洲大陆返回伦敦以后，由于一些慈善团体邀他参加表演，使他演戏、朗诵的才能重新有了表现的机会。他和几个朋友一起，筹备演出了英国作家本·琼生（1573—1637）的剧本《各得其所》（一译《人各有所癖》）。狄更斯不仅兴致勃勃地担任主角，而且还兼任导演、舞台监督和后台工作人员。这次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由于不少慈善团体纷纷邀请他们再次演出，这个同人剧团就不得不到外省市去巡回演出了。过度的兴奋和劳累损害了狄更斯的健康，使他得了厉害头痛病和眼病，但他仍然兴致勃勃，不肯放弃演出机会。

一八五八年，狄更斯应一家慈善医院的邀请，举办小型朗诵会为医院募捐。他从《匹克威克外传》中选了一段来朗诵。朗诵得非常生动，效果极好，收到不少捐款。许多娱乐团体看到这是个极妙的赚钱方法，就纷纷邀请狄更斯去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旅行，朗诵他自己的作品。狄更斯白天坐车晚上朗诵，尽管觉得非常疲劳，还是十分乐意去做这项工作。这除了可以很快得到一笔可观的酬金外，更重要的是使他能够绘声绘色地通过朗诵再现小说中的情节、人物，使他有亲见、亲耳听到读者、听众的反响，从而能在感情上与他们相呼应。他站在台上，当看到台下千百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自己时，当听众被他的朗诵深深地打动了心灵而发出会心的微笑或爽朗的笑声时，当他听到台下热烈的掌声时，这种欢乐、兴奋的心情，是一般作家无法体会到的。以前，他抽象地知道自己出了名，现在通过朗诵表演，他能够捉摸到名声的价值了。在约克地方，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在街上拦住了狄更斯，感谢他在小说中塑造了那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一天，狄更斯的朗诵刚结束，一个老人走过来握着他的手说：“请你跟我握握手，狄更斯先生，愿上帝保佑你，不但为了今晚你给我的快乐，而且也为了你这许多年来给我们全家带来的欢乐。先生，上帝保佑你。”在大街上，在旅馆里，总有不少人热情地对他说：“我喜欢你最近的作品”。朗诵表演使他了解了读者，也了解了自己所从事的文艺工作的巨大价值。

听众的赞扬，读者的喜爱，使狄更斯更加热衷于朗诵表演。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他对每一次朗诵都做了认真的准备。在旅途中，在休息时，狄更斯都在熟悉要朗诵的作品内容，捉摸着怎样用声音更好地塑造各式各样的人物性格。他倾注了全部精力去诵读他自己的作品。他跟听众一道欢乐或悲伤，一起兴奋或懊恼。在《双城记》、《伟大的期望》、《我们共同的朋友》等小说的创作过程中，狄更斯一面紧张地写作，一面又频繁地出外朗诵，有时甚至需要长距离的步行或爬山越岭。这样，就使他十分疲劳，但他还是不断地与人签订朗诵合同。极度的疲劳，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

狄更斯的声誉远涉重洋，美国观众也热情邀请他去美国巡回朗诵。这样，狄更斯于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再度访美并演出，到过波士顿、纽约、

费城、华盛顿等大城市。美国听众狂热地欢迎了他，人们甚至隔夜睡在售票处窗外的凳子上，等待次日购买入场券。小的会堂不能满足观众的要求时，演出地点就改在大教堂。狄更斯诵读的奥

列佛·退斯特的悲惨经历和小耐儿之死，特别受到美国听众的欢迎。狄更斯在美国呆了五个多月，举行了三百七十多次朗诵会，平均一天要登台两次，弄得他精疲力尽。为了应付这种紧张的演出活动，他只好白天谢绝一切社交，躺在沙发上强迫自己休息。晚上出去演出时，因身体过分虚弱，以至必须有人帮助他穿换衣服。由于感冒、脚肿、失眠、鼻膜炎等疾病的缠绕，他不得不结束在美国的演出。

回到英国后，由于身体实在虚弱，狄更斯不得不准备作最后一场告别朗诵会。他选定了《奥列佛·退斯特》中女贼南茜被塞克斯谋杀的一段。朗诵效果十分良好，感动了广大听众，但狄更斯的身体却经不起过分的紧张和兴奋，朗诵一结束，脉搏的跳动急剧加快，患了轻度的中风。休息了几个星期以后，他开始写作最后一部新作《爱特温·屈罗特的秘密》（未完成）。

一八七〇年六月九日，狄更斯在盖茨山寓所写作了一整天。同住的他一个亲戚注意到他的脸色十分难看，知道他是中风了，连忙叫他躺下。狄更斯整夜昏迷不醒，第二天早晨就离开了人间，享年五十八岁。英国人民为失去这样一位伟大作家而全国举哀。狄更斯的形象和他的许多光辉著作，将永远活在世界人民的心中。

主要代表作品

《匹克威克外传》

《匹克威克外传》（1836—1837）是狄更斯获得成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以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为背景，广泛地反映了当时英国城乡的现实生活中种种滑稽可笑的人和事，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开辟了道路。

小说没有完整、严密的结构，整个故事情节围绕着匹克威克先生及其朋友们的游历、遭遇和见闻而展开，尽管比较松散、冗长，却也给读者以新鲜的感觉。

根据小说改编、摄制的英国电影故事片《匹克威克外传》，在我国曾多次上映，因此，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仆人山姆·维勒的形象在我国观众的脑海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八二七年五月十二日，伦敦匹克威克社正在举行会议，研究成立“匹克威克社通讯部”的问题。通讯部由四人组成，有匹克威克社主席、研究社会风俗和人性的学者匹克威克先生，还有研究男女爱情的权威特普曼先生，富有文学才华的诗人史拿格拉斯先生和“全能体育家”文克尔先生。会议决定：他们外出考察、游历，要把沿途听到、看到的风土人情、奇闻轶事连同地方风光作好书面记录，随时向伦敦匹克威克社汇报。

第二天早晨，匹克威克从睡梦中醒来，匆忙吃完早饭。他圆圆的肚子上穿着紧身裤和皮绑腿，手里提着皮箱，大衣口袋里放着望远镜，背

心口袋里放着笔记本，出门登上马车就直奔集合地点。在马车上，他向马车夫了解了许多问题，并认真地做了记录。到达集合地后，他把车钱付给马车夫，不料马车夫却把钱一丢，挥拳顿脚要和匹克威克打架。马车夫气势汹汹地告诉围观和劝架的群众说：他是一个“告密者”，“坐上人家的车子，不但记了号头，还把我说的话一句一句都记下来”，随后一拳打掉了匹克威克的眼镜，紧接着又一拳打在匹克威克的鼻子上，另一举打在匹克威克的胸口上，并把匹克威克的三个同伴也痛打一顿。群众听说他们是“告密者”，也都很蔑视他们。幸亏及时来了一个穿绿色上衣、身材瘦长的青年排开众人，制止了马车夫，才给他们解了围。

匹克威克和伙伴们为了表示谢意，邀请这位陌生人一起到旅馆吃晚饭。席间，特普曼一听说旅馆楼上在开舞会，有许多漂亮女子参加，就认为这是研究男女私情的好机会，渴望去参加。但匹克威克等人却累得直想睡觉，不想参加，于是特普曼就约陌生人一起去了。陌生人抱怨自己没有带礼服，特普曼想到文克尔和陌生人的身材相仿，便私自从文克尔的旅行袋里拿走了礼服。那陌生人穿上钉着匹克威克社社徽扣子的衣服和特普曼一起走进舞场。陌生人玩弄手段，从军医史伦谟手中抢走了舞伴——一个富有的寡妇。军医认为这是奇耻大辱，送上名片要和陌生人决斗。陌生人连忙和特普曼一起溜回房间，悄悄地把礼服放回原处。第二天，军医派人找到了陌生人穿的那套礼服的主人文克尔，要同他决斗。文克尔感到莫名其妙，回去一检查，发现自己的衣服已被人穿过，但他为了维护匹克威克社的荣誉，便同意决斗。可是军医仔细一看，忙说文克尔不是侮辱他的那个人，文克尔也讲明真相，两人握手言欢。文克尔便邀请军医史伦谟和其他两位军官去见见匹克威克先生。他们一进门，其中一个军官当场就揭露了这个陌生人是一个走江湖的戏子，并劝告匹克威克选择朋友要慎重。

洛彻斯特市正在举行阅兵典礼，匹克威克和史拿格拉斯、文克尔等随着人群拥向检阅地点。惊心动魄的演习正在进行：一排士兵从另外一排士兵的头上放枪，放了就跑开；另外一排又从另外的一排人的头上放枪，放了也就跑开；接着是排成许多方阵，把军官们围在当中；后来是用云梯从一边爬下壕沟，再从另一边用同样的方法爬上来；士兵又用英勇的姿态冲锋，冲破了篮子做成的障碍阵。随后，大炮发出了可怕的吼声，以致空中回响着太太小姐们的尖叫声。匹克威克和朋友们被军队的追赶、开枪、冲杀吓得四处奔逃，弄得精疲力尽。走出检阅地点时，碰见特普曼和一辆敞篷的四轮大马车。一位胖胖的绅士华德尔先生看到他们表示欢迎，把他们介绍给坐在车上的妹妹——老处女来雪尔，自己的两个女儿——伊莎白拉和爱米丽，并邀请他们明天去丁格来谷的马诺庄园一游。匹克威克欣然同意。

第二天，匹克威克和他的朋友们雇车前往，但四轮小马车连赶车的位子在内也只能坐三人，只得叫“喜欢”骑马的文克尔骑马前去。大家要匹克威克当赶车的，可是他并不会赶车，但在众人鼓励下，还是勇敢地登上了驾驶台，左手拉着缰绳，右手握着鞭子。那匹马好像欺侮匹克威克似的，经常昂起头来把缰绳绷得紧紧的，匹克威克要费很大的劲儿才拉得住它。那马还时常猛然向路边冲去，随后突兀地站住，随后又向前猛冲一阵，快得完全不能控制。根本不会骑马的文克尔也被马的回旋

打转弄得满头大汗，骑不上去。富有仁慈心的匹克威克看到同伴的狼狈相，连忙把缰绳丢在马背上，下了座位，拿着鞭子赶来帮助文克尔。那匹马一看到匹克威克手里的鞭子，慌忙向后倒退，把始终拽住缰绳那一头的文克尔先生拖了就跑，几乎把他的手臂拉脱了臼。文克尔的手一放下缰绳，那匹马就小跑着走远了。驿车上的那匹马也拖着车子乱跑，撞在木桥上，使车身和轮子分了家，车厢和驾驶台脱了节，幸亏车上的人急忙跳下了车才避免了一场灾难。四个人只好把马卸下来，丢下车子，牵着马步行。他们走到马诺庄园时已近黄昏，好客的华德尔先生一看到他们撕破的衣服，划破的脸，满是灰尘的鞋子，疲乏的面容，连忙接进屋里，摆宴洗尘。

白天的劳累和美酒，使匹克威克等人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匹克威克一醒，就像一个热情的战士似的一骨碌下了行军床。他推开格子窗，大叫“愉快的、愉快的乡村呵”。华德尔先生来问了早安，告诉他们早晨是打鸟的好时光。他一听说文克尔的枪法很好，就邀他去打鸟。文克尔其实不会打猎，却不好意思说明，结果吓得双手发抖，胡乱打枪。枪声一响，白嘴鸦四散飞去，却不料子弹擦伤了特普曼的手臂。早饭后，华德尔和匹克威克等人一起去看板球比赛，而把特普曼留下让老小姐来雪尔护理。当他们晚上回来时，特普曼已经和老处女谈起恋爱来了。两人热情接吻，甜言密语不绝于耳。随同匹克威克一起回来的，还有在板球场上碰见的原先认识的那个陌生人——金格尔。金格尔是个骗子，他一到庄园不满五分钟，就暗下决心要进攻老小姐，以便骗取她的一笔财产。他大耍两面派手法，当着老小姐的面污蔑特普曼和她侄女接吻拥抱，并胡说特普曼是为了想老小姐的钱财而对她表示亲热，从而赢得了老小姐的青睐；在特普曼面前，金格尔又装作特普曼的朋友，为他和老小姐穿针引线。在特普曼表示感谢时，金格尔马上以借钱的名义向特普曼索取了十个英镑。

一个仆人带来了金格尔拐骗老小姐一同乘驿车逃走的消息。华德尔和匹克威克非常气愤，急忙驱车追赶。快要追上他们时，华德尔的马车因追之过急，造成马车翻身。人们好不容易从马车的残骸堆里用力把华德尔和匹克威克拉了出来，两人的衣服都摔破了，马车的碎片散在他们脚下。金格尔却在另一马车里挖苦、讽刺他们，更引起两人怒火万丈。

当华德尔和匹克威克带了律师潘卡来到金格尔住的旅店时，金格尔和老处女已经从教堂领来了结婚证明。金格尔借口老小姐有权处理自己的婚姻问题，不承认是拐骗。在律师的调解下，以一百二十镑的代价放回了老小姐。那个冷酷的骗子却故意把结婚证明丢在匹克威克脚下，说：“把名字改一改，把女人带回家，给胖子去吧！”匹克威克在狂怒之下把墨水瓶向他扔去，但是金格尔已经不知去向了。于是华德尔、匹克威克带着伤心的老小姐回到了庄园。匹克威克和朋友们都觉得不宜再继续留在这里，于是向主人告别后，就离开了。

一天，匹克威克和特普曼在返回旅馆的路上，走到村庄的一所茅屋门前，发现了一块一半露出地面一半埋在地里的破石头，匹克威克连忙双膝跪在小石头前面，小心地把它挖出来，并且用手帕替它擦灰。

“这上面有铭文呢，”匹克威克说。

“真的吗？”特普曼先生说。

“我看得出，”匹克威克继续说，一面用全副气力擦灰，并聚精会神地辨认上面的字：“我看得出有一个十字，一个 B 字，然后是一个 T 字。这是很重要的”。匹克威克跳起来继续说：“这是一个很古的碑文，也许比这里的古老救济院还要古得多。可不能把它埋没呵。”他以十先令的代价向茅屋主人买下了那块小石头，他小心地把石头洗完后又把它放在桌上。石块不平而又破碎，字迹零乱而不规则，但是下面的一部分铭文的片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来：

+

BILST UM PSHI S.M.ARK

匹克威克坐在那里欣然凝视着他所发现的宝物，他的眼睛里闪着激动的火花。他庆幸自己在富有古迹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奇怪而有趣的古代碑文，而他以前的许多学者竟然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特地向老板娘买来一个松板小箱子，把这块重要的石头放在里面，并同伙伴们欢宴到深夜。

回到伦敦，立刻举行匹克威克社全体社员大会，匹克威克就发现宝石一事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并对铭文的意义作了种种天才而博学的推测。一位高明的艺术家把刻在石头上的珍物作了一幅忠实的写生画，送到了皇家考古学会和其他学术团体去鉴定，大家围绕着石头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匹克威克本人也写了一部小册子，有九十六页，都是很小的号字，里面提出了有关那铭文的二十七种不同的读法。结果，匹克威克因为有这个发现而成了十七个本国的和外国的学会的名誉会员。这十七个学会尽管没有一个能对铭文作任何解释，但是它们全都同意那是非常不平常的发现。

正在大家众口交誉之时，有一个名叫布辣顿的人，却亲自去向那石块的主人——茅屋里的工人作了调查。那人认为石头是古的，但那所谓的“铭文”，却是他自己在无聊的时候随随便便刻出来的。那些字母所表示的不是别的，只不过是“BILL STUMPS, HIS MARK (皮尔·史登普斯，他的记号)”这几个字。史登普斯先生因为不大熟悉文字的拼写规则，而是直接按照声音来拼写，因此，就把他的教名 BILL (皮尔) 的第二个 L 字母丢掉了。

匹克威克社认为这有损该社声誉，决定开除布辣顿的社员资格，并赠送匹克威克一副金边眼镜，作为他们对匹克威克的信任和嘉许。匹克威克也请人给他自己画了一幅肖像挂在社里。布辣顿写了一本小册子阐述他的论点，隐约攻击十七个学会内尽是些骗子。当然十七个学会群起而攻之，形成了著名的所谓匹克威克科学论战。

匹克威克想雇佣一个男仆跟自己一起去旅行，便跟寓所的房东寡妇巴德尔太太商量，不料巴德尔太太却以为匹克威克看中了她，竟搂住匹克威克的头颈大叫“你这仁慈的、好心肠的、爱开玩笑的、可爱的人”，瀑布似的眼泪和合唱似的呜咽，弄得匹克威克不知所措，后来这位胖太太竟倒在匹克威克的怀里晕了过去。这时，门外有人走进来，匹克威克的伙伴们进来目睹这种情景，大惑不解。不久，马车夫的儿子山姆·维勒经人介绍来见匹克威克，愿意作为他的男仆浪游四方。

匹克威克一行兴致勃勃地来到在英国地图上找不到的一个假想的市镇伊顿斯威尔，参观这个城市国会议员的选举活动。那里存在“蓝党”和“浅黄党”两个政党。蓝党和浅黄党人利用一切机会反对对方。假使

浅黄党提议在市场上开个天窗，蓝党就召开群众大会，痛斥这个提议；如果蓝党提议在大街上多造一个水龙头，浅黄党人就一齐起来大惊小怪地反对。商店分成蓝党商店和浅黄党商店，旅馆也这样分，连教堂也有蓝党的过道和浅黄党的过道。这两个党派的机关报更是互相辱骂、攻击，“丢脸”、“怯懦”、“虚伪”、“下流”、“卑贱”、“造谣”、“诽谤”等等字眼充斥着报纸。两党的竞选团在各大旅馆、商店和公共场所挂着蓝色或浅黄色的旗帜，贴着花花绿绿的标语；宣传鼓动站为各自的候选人吹嘘、宣传，摇旗呐喊。

正式投票选举的那天更是热闹非凡。手拿蓝色或浅黄色小旗的队伍一队又一队，每队都有拿着蓝色或浅黄色棍子的警察，还有包括喇叭、低音笛和鼓在内的大乐队。旗帜哗哗地随风飘扬着，乐队吹奏着，警察咒骂着，群众叫唤着一齐奔向选举会场。

在市中心的选举会场上，市长和他的同僚们站在选举台中央，左右两侧是两党候选人。候选人都把手按在胸口上，极其“诚恳”地对空地上的汹涌的人海鞠躬；那里卷起了一片呻吟、呼唤、呐喊和咒骂的风暴。一个党的候选人讲话，另一党的乐队就使劲地吹奏起来，接着是两党的信徒相互挤轧、推撞和殴打。台上浅黄党候选人把蓝党候选人打得头破血流，蓝党候选人当然要向浅黄党候选人拚命。在市长的干涉下，两党候选人又被迫相互脱帽致敬。接着举行投票，蓝党候选人获胜，浅黄党报纸攻击蓝党在选举中营私舞弊。这场选举真是一场绝妙的好戏，使匹克威克一行大开眼界。

伊顿斯威尔名流亨特尔先生和夫人盛情邀请匹克威克参加游园会。在游园会上，一个海军军官装束的青年人走了进来。当他刚刚握住亨特尔夫人的手时，眼光就碰到了匹克威克的愤怒的眼神，便马上找了一个借口溜之大吉。原来这个海军军官就是骗子金格尔假扮的。匹克威克和山姆·维勒跟踪追到金格尔住的旅馆。这个骗子怕事情败露，便先发制人。他指使同伙乔伯·特拉脱向匹克威克密告一个假消息，说金格尔今夜要拐骗寄宿学校一个女学生私奔，请匹克威克深夜去拯救那个少女，并表示愿意配合，共同捉贼。

匹克威克信以为真，深夜爬上墙头，翻进女子寄宿学校的花园。教堂的钟声和谐地敲着，刚巧是十一点半。突然，电光闪闪，雷声隆隆，下了一场雷阵雨。匹克威克的前后左右都是大树，他深知雷雨时站在大树下的危险性；然而，如果他在园子中间露了面，就会被人交给警察。于是他试着爬墙，但胖胖的身体根本爬不上那下雨后变得滑腻腻的墙壁，身上反而留下不少伤痕，急得满头大汗。他只好用白天和特拉脱约好的暗号，轻轻地敲了敲门。这一下子却把女子学校的人都惊动了，女校长、女教员、女学生、女仆人、女厨子，一共三、四十人拥了出来。一个从门缝里窥探的女学生忽然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啊，男人——男人——在门背后！”匹克威克不得不站出来声明：“我不是强盗。我要找这里的校长。”他告诉女校长今夜有一个女学生要跟流氓金格尔私奔。女校长根本不认识金格尔，也没有发现哪个女学生要逃跑。匹克威克明白自己上当、受骗了。为了取信于大家，叫她们派人叫来了男仆维勒作证，这才真相大白。原来这是金格尔设下的陷害匹克威克的圈套，而金格尔自己则早已和特拉脱逃之夭夭。匹克威克气得咬牙切齿地赌

咒：“我只要再碰到这个金格尔，除了叫他受到咎有应得的暴露以外，还要揍他。我要揍他，不然我不姓匹克威克。”

匹克威克黑夜受了惊，淋了雨，风湿病发作，倒在床上。正当他病愈准备出发时，突然接到一封奇怪的信：

先生：

我们受了巴德尔太太的嘱托，对你提出了毁弃婚约的控诉，原告要求赔偿损失一千五百镑；本案已由民事诉讼法庭受理发出训令。请复函告知贵方在伦敦的代理人姓名，以便办理正式手续。

你的忠顺的仆人 道孙和福格

匹克威克看了发急地说：“这是一个阴谋，是那两个贪婪的律师道孙和福格弄出来的卑鄙的阴谋。巴德尔太太决不会这样做的。这是下流无耻的敲竹杠。”

有一天，匹克威克一行又到了华德尔先生的庄园。主人和客人们一起外出打猎，中午，他们吃了一顿别有风味的野餐。匹克威克兴奋得饮酒过量，再加上天气闷热，便倒在一辆小车里昏沉沉地睡着了，其他人则继续去打猎取乐。一个叫鲍尔德威的大尉带着园丁恰好走进树林，看到有人越界打猎，一个胖乎乎的人还睡在小车上，就命人把熟睡的匹克威克推到附近收客无主禽兽的公家兽栏里去。村里的居民哄动了，大家聚集在兽栏周围，大声地叫喊“看把戏呀！”喊声把匹克威克吵醒了，大叫：

“我在什么地方？”

“在公家兽圈里，”群众回答说。

“让我出去，我的当差呢？我的朋友呢？”

“你哪有什么朋友呀。啊哈！”于是飞来了一只萝卜，接着是一只马铃薯，一只蛋，还有其他一些群众捉弄他的动作。幸亏华德尔先生和维勒的马车迅速驶来，才给匹克威克解了围。华德尔把匹克威克抱上车，维勒和本镇差役单身格斗。匹克威克气愤地说：“我要叫人控告这个鲍尔德威大尉，告发他非法拘禁。”华德尔则劝他息怒，说：“万一他们反过来告我们喝醉酒肇事怎么办？”于是，匹克威克脸上的怒气消失了，浮上了微笑；微笑扩大为大笑；大笑成为哄笑。笑声感染了大家，大家都高兴起来了。为了保持这样的好兴致，他们又在一个酒店里每人喝了一杯掺水白兰地。

几个月以后，匹克威克一行又应邀赴华德尔先生的庄园共度圣诞节。“全能体育家”文克尔明明不会溜冰，却装作内行，结果把别人撞倒，自己也跌得爬不起来。山姆·维勒的滑冰技术却非常熟练，正在斜坡上表演一种叫做“敲修鞋匠的门”的花样滑冰。这是一只脚在冰上溜，另外一只脚时不时地像邮递员敲门似的在冰上敲。那花样使匹克威克也动了心。

“这倒似乎是很妙的取暖方法呵，是吗？”他问华德尔。

“啊，是嘛，的确。”华德尔答。“你滑吗？”

“我小的时候时常在阳沟里这样玩的，”匹克威克回答。

“现在再来试试看吧，”华德尔说。

华德尔和一群女士们不断邀请匹克威克溜冰，匹克威克感到盛情难却，便脱下了手套，缓慢而庄严地从斜坡上滑了下去。其他人也一个接一个，紧接着前面的人滑了下去。当滑冰游戏进行到最高潮、速度最快、笑声也最响亮的时候，忽然听见尖锐而猛烈的拆裂声。一大块冰不见了，水冒上来了，匹克威克的帽子、手套和手帕漂在水面上，而匹克威克却被水淹没了。众人焦急万分，正要设法抢救，忽然看到水下面冒出一个人头，接着，看到了了一张戴着眼镜的脸孔，这是匹克威克的尊容。幸好水不深，大家一拉就把匹克威克拉了出来，连忙把他送回庄园，擦干身子钻进被窝，又让他喝了一大碗五味子酒，酣睡了一觉，这才避免了风湿病的发作。

匹克威克毁婚案开庭了。又矮又胖的审判官史太勒先生刚刚就座，法庭正厅里的一位官员就用命令的口气喊：“肃静！”走廊里的另一位官员用发怒的态度叫“肃静！”又有三、四个传达吏用训斥的声调大呼“肃静！”原告律师长篇累牍地搬弄法律术语来控告匹克威克的毁婚。说这不仅毁了这个善良寡妇的职业，而且毁了她的希望和前途，使得她们母子俩陷于悲哀和痛苦之中，要求“正直的、善良的、有同情心”的陪审官责令“没有心肝的”匹克威克赔偿一千五百镑。尽管匹克威克和被告律师再三反驳、辩护，法庭仍然判决匹克威克缴纳赔偿金七百五十镑。正直、善良的匹克威克为了维护正义，维护自身的名誉，不肯向恶势力低头。他公开骂道孙、福格是骗子，指责他们所干的事情，“是世上所有坏事中间最无耻、最下流的”，并表示即使被关进债务人监狱也不缴纳一分钱的赔偿费。

由于匹克威克不肯缴纳诉讼费和赔偿金，就被法院逮捕关进债务人监狱。一个绅士陪着匹克威克和维勒跨过铁门，通过监狱的一条又长又狭的过道。那里既污秽，光线又暗，只有相隔很远的两头各有一个窗户透进微弱的光线。在黑暗和污秽的台阶下面，还有一排潮湿、阴暗的石头地牢。匹克威克一听说有人住在里面，就激动地大叫：“生活！生活在那下面！”那位绅士却平静他说：“生活在那下面！是嘛，还死在那下面呢，那是平常的事情！”匹克威克还听到了一个囚犯因欠了九英镑而关了十七年的故事。他亲眼看到一个年轻妇女抱着一个由于衰弱和贫困几乎还不会爬的婴孩，和她的丈夫在过道里悲伤地痛哭；他又看到一个嘴唇没有血色，骨骼又突出、又瘦削、囚禁了二十年的犯人；而整个牢房脏得令人不能容忍，烟味使人窒息。看到、听到、嗅到的这一切，使匹克威克的心情十分沉重，晚上久久不能入睡。

后来，匹克威克在律师的陪同下，又参观了债务人监狱的穷人部。这里关着的当然是负债者当中最穷苦、最低贱的人们。这里的犯人不用付饭钱和房租，一切费用照他们坐牢的日期拆减。不久前在监狱围墙旁边还有过一只铁笼子，里面站着一个囚犯，手里摇着钱箱，用可怜的声音叫唤：“做做好事，记住穷苦的负责人。”他用乞讨的收入分给穷苦的负责人，而站在铁笼子里的囚犯，是由穷苦的负责人轮流担任的。目前这个铁笼子虽已废除，但穷人的苦痛依然如故。匹克威克深深感到法律的不公正：对强壮的凶犯，监狱里倒给吃给穿，而对身无分文的负责人却不管吃穿，听任他们饿死、冻死。想到这些，他的心情更为沉重。当他的眼光偶然落到坐在积满灰尘的火炉旁边的一个男子身上时，不觉

惊呆了，手里的帽子掉在地板上。原来这个人正是骗子金格尔。他的衣服破烂，白布衬衫发了黄而且成了碎片；头发披在脸上，面色像死灰一般，脸上充满痛苦的表情。他的头托在手上，眼睛盯着火炉，一副贫穷、落魄的狼狈相。接着，他又看到全格尔的同伙特拉脱，也是穿着褴褛的衣服，也是一副穷相。金格尔向匹克威克诉说了自己落魄江湖、穷愁潦倒的经过，并对过去的行为表忏悔，说完又用手掩住脸像小孩子一样地抽泣起来。见到这个曾经给他吃过多少苦头，欺骗过多少善良人的坏蛋，匹克威克本应该结结实实地把他痛打一顿。但一看到这副可怜相，他的恻隐之心又油然而生，决心以德报怨，非但不打不骂，反而替他们从当铺赎回衣服，代他们付了房租和饭钱，还请医生给他们治病，夜里还去看望他们。

匹克威克参观了穷人部以后，心里十分难受，痛苦他说：“我看够了，这些景象叫我头痛，我的心也痛。”整整三个月，他白天呆在牢房里，夜里才走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匹克威克要山姆·维勒离开他几个星期，但维勒不忍心看到善良的主人一个人在监狱里受苦，也设法住进了牢房。

狠心的律师道孙和福格眼看从匹克威克那里捞不到诉讼费和赔偿金，便把巴德尔太太送进了债务人监狱，逼她交付诉讼费。匹克威克的法律顾问潘卡先生听到了道孙和福格强制巴德尔太太偿付诉讼费的消息后，马上进监狱说服匹克威克，要他代巴德尔太太偿付诉讼费一百五十镑，把这个女人从悲惨的牢房中拯救出来。然后由巴德尔太太提出要求撤销控告的悔过书，这样，不仅巴德尔太太和匹克威克都可以出狱，而且赔偿金也可以不必再付。匹克威克接受了这个意见，终于出了狱。多少难友来和他握手告别，他激动地向囚犯们说：“可怜的人，可怜的人！”“上帝保佑你们，我的朋友们！”这一瞬间，匹克威克比最初进来的时候还要悲哀和忧郁。唉！有多少悲哀和不幸的人被他抛在后面了呢！他们还要继续经受多少苦难啊！

匹克威克出狱后，马上代金格尔还清了债务，使他恢复了自由，并介绍他和特拉脱一起到利物浦工作。金格尔感动他说：“匹克威克先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并表示决心重新做人，拼命工作，以报答匹克威克先生的恩情。

道孙、福格来潘卡律师事务所索取诉讼费一百五十镑时，居然若无其事地招呼、问候匹克威克，脸上不但毫无悔过之意，反而带着宽恕别人的、高傲自若的神气。忍无可忍的匹克威克斥责他们说：“你们怎么能无耻到这种地步？你们知道我就是被你们监禁和掠夺过的人吗？谁给你们放肆地侮辱人的权利？”匹克威克痛骂两人是“卑鄙的流氓、讼棍和强盗”。一边骂，一边做了一个凶狠的手势，使两个坏蛋吓得魂不附体，溜掉了。匹克威克现在心里卸掉了一块大石头，感到十分舒适和快乐。

匹克威克看到他的伙伴们之间发生了许多变化，有的已经结婚，有的将要结婚，于是决心解散匹克威克社。自己在伦敦近郊找了一个安静舒适的房子隐居了。这样，历时两年多的旅游生活结束了。他设宴向大家告别。在会上，他愉快地宣称，“旅游增长了我的见识，加深了我对世界的了解。假使我做过的好事情不多，那么我相信我做过的坏事情也

很少。我所遭遇的一切，对于我，无非是晚年有趣的和愉快的回忆的来源。上帝保佑大家幸福！”说完这些，匹克威克用颤抖的手倒了满满一大杯酒喝了；在他的朋友们全体起立、由衷地对他干杯祝贺时，他的眼睛潮湿了。

匹克威克住在宁静、舒适的别墅中，空闲时间就整理备忘录。他虽然不如从前健壮，但还保留着以前的爽朗和乐观的性格。人们常常看见他到德里治画廊去看画，晴天则在风景宜人的地方散步。附近的穷人都认识他，每逢他走过，总是怀着极大的敬意向他脱帽致敬，孩子们和周围群众都把他当偶像一样地崇拜。他每年到华德尔先生家去参加一次大规模的家庭欢宴。他总是由山姆·继勒陪伴着，尽管维勒已经结婚，生了两个胖胖的儿子，但仍然忠心地服侍着主人。

他的朋友文克尔新婚之喜后搬进了新建的房子，担任他父亲在伦敦的经纪人的职务；史拿格拉斯和太太——华德尔的女儿爱米丽住在丁格来谷，经营农场，在朋友和熟人中间仍享有大诗人的名声；特普曼没有结婚，他那朝气蓬勃的神气，赢得了单身老妇人的赞美；金格尔和特拉脱已改邪归正，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

《匹克威克外传》通过对匹克威克及其朋友们旅游的经历的描写，广泛地反映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城乡的生活面貌。作品描述的人物有贵族、地主、资本家和政客，还有军官、牧师、律师、旅店主人、太太、小姐以及底层社会的各种人物；活动的地点从客店、公寓、地主别墅到法庭、监狱。整个小说从内容上看，有对外省富于诗情画意的田园生活的描绘；有对诱骗富家妇女、从中捞取钱财的坏蛋的谴责；有对资产阶级政党之间为了竞选而相互攻击、谩骂、殴打、混战的讽刺；有对律师挑拨离间、骗钱害人行为的揭露；有对不公平、无是非的司法诉讼制度的控诉；还有对听任穷人冻死、饿死的债务人监狱的黑暗的描写，等等。

《匹克威克外传》是狄更斯史诗般地、具体生动地描写当时的社会生活，并揭露生活中某些阴暗面的第一部小说，是十九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第一个重要成果。

《匹克威克外传》以普通的中、小资产阶级人物匹克威克先生作为主人公。他和他的朋友特普曼、史拿格拉斯、文克尔尽管有钱，却没有大资产阶级人物那种惟利是图、贪婪狡诈的恶习。特别是匹克威克先生，他生活富裕，大腹便便，但他是个有教养、善良天真、忠厚乐观、主持正义、爱打抱不平、和蔼可亲的人。这集中表现在他同流氓、骗子金格尔和坏蛋讼师道孙、福格的斗争上面。

但是，匹克威克对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产生的道德败坏和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这一点缺乏认识，往往用传统的道德标准和温情的处世哲学来观察、处理现实问题。他那富于幻想和脱离实际的性格，又使他一接触实际生活中的坏人坏事，就容易上当受骗，显得天真可爱，但又滑稽可笑，成为堂·吉珂德式的人物。作者对于他的主观武断和脱离实际的可笑言行，进行了善意的嘲笑和讽刺。例如他把一块破石头当作稀有的古董，把一个工人在上面随便乱刻的字当作“铭文”，看了不禁令人哑然失笑。

在写作《匹克威克外传》的时候，狄更斯对英国社会存在着乐观主

义的幻想，小说开头几章的成功，更使他充满乐观情绪。他天真地相信正直善良必然会战胜阴险邪恶，光明一定会盖过黑暗的阴影。因此，书里揭露的坏人坏事，仅作为一种“社会弊端”来描写，对人们并不构成重大威胁，而且狄更斯相信这种弊端终会根绝。他在《匹克威克外传》的序言中公开写道：当这种种弊端根绝的时候，“城乡的长官们也将学会每天跟‘常识’和‘正义’握手言欢；……学校，在基督教的广泛原则之下，将成为这个文明国度全境内的最好的装饰，监狱之门非但在里边妥闷紧锁，外面亦妥闷紧锁；为维持像样的、适合健康的生活所必需的一般资源得以普遍分享，既使富人和国家能借以保障安全，而穷得无以复加的人亦能享受这项权利”。由于这种思想的指导，以致小说中那个原先被匹克威克骂为坏蛋、流氓、骗子的金格尔，也在匹克威克的以德报怨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感化”下，对给他衣食、介绍工作的匹克威克感恩戴德，决心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浓厚的社会生活气息、古老英国的、特别是农村中许多有趣的生活习俗的描写，在作品中占着重要的地位，这反映了作者对英国社会的幻想，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及其根源缺乏深刻认识。他自称写作《匹克威克外传》的目的只是“介绍一些越人趣事”，这正说明了当时狄更斯对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的认识还很不足。

在艺术风格上，狄更斯式的幽默和乐观风格已经在匹克威克身上形成。作品的文字、语言并不简练，但却灵活丰富，巧妙多变。匹克威克这个人物的语言有些冗长，文绉绉的，俨然是绅士说话的派头；他的仆人山姆·维勒的用语则满口伦敦方言，机智而又活泼，还善讲滑稽的俏皮话和谚语，还有规律性的拼音错误和文法错误。小说的结构、体裁继承和发展了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和《堂·吉珂德》的游历冒险故事的形式，大故事套小故事。这种结构的好处是描绘现实生活的面比较宽阔，缺点是结构松散，情节拖沓，主线不突出。当然，这个缺点是跟小说先在杂志上分期连载，事先没有统一安排的情况有关的。

《奥列佛·退斯特》

《奥列佛·退斯特》（1838）是狄更斯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作品第一次广泛而真实地描写了外省贫民收容所和伦敦贫民窟的地狱般的生活，展现了英国下层社会的悲惨图景。

早在一九〇八年，著名翻译家林纾（琴南）就以《贼史》为书名把《奥列佛·退斯特》翻译、介绍到我国来。林纾在译者序言里说，狄更斯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抨击社会的积弊，使当政者知而改之。解放以后，根据小说改编、摄制的英国故事片《雾都孤儿》多次在我国上映，深受我国广大观众的喜爱。

在英国某镇的贫民收容所里，一个新生的男孩呱呱落地。躺在铁床上的一个年轻女子，脸色灰白，用微弱的、吐字不完整的声音向旁边的医生和充当护士的老婆子说：“让我……看看孩子……再……死。”医生闻声走到床头，用温和的声音说：“噢，你不要说这种话，还不至于呢！”那个老婆子也合掌央告上帝“保佑她的心”。但是安慰的话并没有发生应有的作用，病人摇摇头，向婴儿伸出了手。医生把孩子放在她手臂里。她用冰冷、苍白的嘴唇，吃力地亲着孩子的额头，然后，全身抖了几下，倒在枕头上死了。

医生对死去的女人端详了一番后说：“她倒是个漂亮的姑娘。她是从哪里来的？”老婆子回答道：“昨天晚上送进来的。人家看见她昏倒在街上。她的鞋子破得一片一片了，可见她走过很远的路。但是她是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

贫民收容所的管理员本布尔先生按照字母的顺序，给这个孤儿取名奥列佛·退斯特。奥列佛被包在一件已经变成黄色的旧棉布长衣里。他被标上了号码，成为贫民收容所里收养的一名婴儿。

本布尔把奥列佛寄养在一个专靠剥削小孩生活费为生的女人家里。饥饿使奥列佛发育不全，身材矮小，苍白、瘦弱。九岁那年，奥列佛又被领回收容所，充当从事剥麻劳动的童工。恶劣的环境，沉重的劳动，每天只吃三顿稀粥的劣等生活条件，使孤儿的身体越来越瘦弱。

孩子们吃饭的大厅中放着一口大铜锅。每个孩子一顿只能吃一碗稀粥，遇到重大的节日，才可以增加两盎斯又四分之一的面包。碗是从来不用洗的。孩子们用调羹能把它刮得重新露出光来；而碗比调羹也大不了多少。奥列佛和同伴们受不了这种慢性饿死的煎熬，眼睛里都冒出狂乱的、饥饿的光。于是他们私下商量，抽签决定由奥列佛为代表，向管事要求“添一点”。

那天晚上，喝完一碗稀粥后，孩子们相互耳语，对奥列佛挤挤眼，他旁边的孩子们也用手臂推推他。奥列佛是个瘦弱的孩子，饥饿逼得他去冒风险。他大着胆子拿了碗和调羹轻轻地走到管事面前说：“对不起，先生，我要添一点。”那个胖胖的管事呆住了，他对这个孩子注视了几秒钟，用微弱的、似乎不解的声音说：“什么！”奥列佛重复说：“对不起，先生，我要添一点。”当管事清醒过来的时候，立即把这件“大事”上报给董事们。奥列佛的这个行动使正在开会的董事们大为震惊。他们狂叫“这孩子将来要处绞刑”，马上把这个“大逆不道”的“小叛徒”禁闭起来，并贴出布告说，谁愿意领走奥列佛，可得酬金五英镑。

为了杀一儆百，管理员本布尔让奥列佛在严寒的冬天在露天里，用冷水冲洗身体，每隔一天带他到童工们吃饭的地方鞭打示众。

不久，十岁的奥列佛成了棺材店老板沙威必利的学徒。晚上，奥列佛孤零零地睡在店堂里。店堂里放着不少空棺材，这些黑色、棕黑色的棺材显得那么阴森、可怕，每当他的眼光碰到它们，浑身就颤抖。他想：那里面大概会有一个怕人的东西慢慢抬起头来，把他吓得发疯。沙威必利认为奥列佛脸上有一副哀伤、忧郁的表情，适宜于做一个逗人喜爱的执紼人。这样，奥列佛就经常被老板喊去参加送殡。送殡时，总是奥列佛领头，拿着黑色的手杖，帽子上黑色的带子一直拖到膝盖上。他的姿态和容貌博得了镇上妇女们的赞叹。可是，这却引起棺材店里一个年龄较大的学徒诺亚的嫉妒。一天中午，诺亚突然对奥列佛扯头发，拧耳朵，骂他是“蠢种”，并公开侮辱他的母亲是“一个十足非常坏的坏货。”奥列佛气得满脸绯红，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奋起扼住诺亚的喉咙，集中全力把他汀倒在地。沙威必利太太和女佣听到诺亚的呼救声，急忙赶来。这样，奥列佛被关进了地窖。这时，诺亚抽身飞奔到贫民收容所向本布尔求救。本布尔立即带着藤杖赶到地窖，会同刚回店的沙威必利，把奥列佛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奥列佛忍受不住这样的虐待，便连夜逃走了。

他沿路行乞，腹中饥肠辘辘，身上冷得打颤，四肢酸痛，寸步难行，晚上就钻到干草堆里安身。就这样走了七天，才到了伦敦郊外一个镇上。他孤独、悲伤地坐在一户人家门前冰冷的台阶上，沾满了灰尘的脚在流着血。一个戴着礼帽、绅士模样的青年上前对奥列佛说：“喂！我的伙计，怎么回事？”奥列佛眼里含着泪回答：“我非常饿，非常累，我走了很长的路，……我走了七天。”这个青年绅士扶奥列佛站了起来，带他到附近一个杂货铺买了一大块熟火腿和两磅面包给他吃，并且告诉他自已各叫贾克·道金斯，绰号“闪不见”。这样，两人就交上了朋友。

天黑以后，两人一起走进伦敦的贫民窟。这里的街道又狭窄又泥泞，空气里充满着臭味，喝醉了的男人和女人就在酒店门口污秽的泥地上打滚，还有一些满脸凶相的恶汉偷偷摸摸地钻出屋子。奥列佛正打算转身逃走的时候，却被“闪不见”拉进了弄堂的一家大门里，爬上黑暗、破旧的楼梯，进了一个房间。房间里的墙壁和天花板，已经由于厚厚的污秽而变成黑色了，壁炉前面有一张松木板桌子，一个老犹太人站在旁边。他穿着一件油腻腻的法兰绒长袍，手里拿着一只长叉在火上烤腊肠。他那满是皱纹的脸露出一副凶相，令人十分憎恶。桌子旁边还围坐着四五个孩子，吸着烟斗，喝着酒。“闪不见”给双方介绍以后，那个叫做法琴的犹太人对奥列佛鞠了一躬，并且握手表示欢迎。这样，奥列佛在这个贼窟里吃了一顿晚饭，美美地睡了一个长觉。

第二天，奥列佛从睡梦中醒来，看到法琴一个人正从地板下面一个什么机关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揭开盒子盖，取出了一只富丽堂皇的金表，上面的宝石还闪着光。接着，他又从那只盒子里接连拿出半打以上的金表，此外还有戒指、胸针、手镯和其他珠宝首饰。法琴正津津有味地鉴赏这些金银珠宝的时候，突然发现奥列佛已经醒来，眼睛正好奇地盯着他。他立即把盒子盖上，拿起一把放在桌子上的面包刀，狂怒地站起来，恶狠狠地怒视着孩子说：“你看见了什么？”“你是不是在一个小时以

前就醒来了？”

“不是，不是，真的。”奥列佛回答。

“确实吗？”犹太人带着威胁的口气追问。

“确确实实的，先生。我没有醒，真的，先生。”奥列佛急切地回答。

法琴于是恢复了常态，笑嘻嘻他说：“我的好人，我不过是吓吓你。你是个勇敢的孩子。”过不多久，“闪不见”和其他几个孩子也回来了，有的拿出皮夹子，有的拿出手帕来。法琴让孩子们向奥列佛表演如何从一个老绅士的口袋里掏出表、别针、票夹、手帕和眼镜盒子的“游戏”。犹太人对奥列佛说：“照他们教你的做法去做，你会成为一个大人物。”天真的奥列佛真的认为这种从别人口袋里掏东西的扒窃行为是一种游戏。

一天，奥列佛跟着两个孩子一起去“学习手艺”。两个孩子走到一个正在书摊前面看书的老绅士身边，伸手从他口袋里抽出一条手帕来，然后两人从路角逃掉了。在这一刹那间，手帕、表、珠宝和犹太人，这全部秘密冲到奥列佛的脑子里。他由于恐怖而心脏都收缩起来，吓得他拔脚就跑。那个绅士把手向口袋里一摸，发现手帕没有了，立刻转过身来。他看见奥列佛这样匆忙地奔跑，就认为他是小偷，便高喊“捉贼”，并跟着追去。那两个小偷不愿意在大街上奔跑引起公众的注意，便躲在拐角的一家大门口，一听到叫喊声，又看到奥列佛在奔跑，马上敏捷地钻了出来，附和着公众大喊“捉贼”。于是，奥列佛被当作贼抓住了，躺在地上，满身是泥和灰，嘴里流着血。他对赶来的老绅士说：“实在不是我呀，老爷。真的，真的，那是另外两个孩子。”可是那两个小偷早已趁着混乱之机溜掉了。

警察把被打伤的奥列佛扭送到警察局，警官胡乱判处奥列佛服苦役三个月。幸而摆书摊的人及时赶到，说明偷手帕的是另外两个孩子，这样，奥列佛才被释放。这时，奥列佛被这一场虚惊吓得仰面昏倒在石板地上，全身抽搐着，脸色苍白得像死人一样。那个被偷手帕的绅士名叫布龙洛，他被孩子的脆弱和驯良的外貌所感动，就雇车把奥列佛带回了自已富丽的公馆。奥列佛一连发了几天高烧，神志不清。等他醒过来时，看到一个老奶奶慈祥地守护着他，还烧了美味的肉汤让他喝。布龙洛待他像亲生父亲那样，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奥列佛得到了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关怀和照顾。布龙洛仔细端详了这个孩子，发现他的脸酷似家中悬挂在墙上的那幅年轻女子的画像。

贼首法琴和同伙塞克斯听到奥列佛被捕的消息，深怕奥列佛招供泄漏他们的秘密，便派女贼南茜去打听情况。当他们得知奥列佛被那绅士带走的消息以后，便设法寻找绅士的住址。

奥列佛在布龙洛家里舒舒服服地休养了一段时间。一天，布龙洛派奥列佛捧一包书和五英镑钱给摆书摊的人。奥列佛以能为仁慈的老绅士做点事而感到高兴，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书摊。突然，一个年轻女子的叫声把他惊动了。“啊，奥列佛，我亲爱的兄弟！你这顽皮的子，叫我为你受这样的痛苦，回家去吧！”这个女子哭哭啼啼地抓住奥列佛的手说：“马上回家去吧，你这残酷的孩子！走！”这个假装成奥列佛姐姐的南茜竟向旁观的人们扯谎，说奥列佛丢下了父母跑出来跟坏人鬼混。

尽管奥列佛再三声明不认识这个女人，但仍被南茜和她的情夫、惯窃塞克斯抓回贼窟，不仅带来的书、钱和身上的新衣服被没收，还被毒打了一顿。

狡猾的法琴把奥列佛关在贼窟，使他感到寂寞、郁闷，后来给他讲述滑稽可笑的抢劫、偷窃的冒险故事，逗得奥列佛忍不住开怀大笑。

法琴和塞克斯密商抢劫一所大宅第，需要一名小孩同往，于是法琴把奥列佛交给塞克斯。塞克斯拿手枪指着奥列佛的太阳穴，警告说：“当你和我到了门外之后，除非我对你讲话，你要是说一个字，子弹就在你的脑袋里。”

一天深夜，塞克斯和另一同伙带着奥列佛到了一座别墅。塞克斯用手枪对着奥列佛，命令他钻进一个大小只能容得下奥列佛这样身材的孩子的窗户，叫他穿过厅堂走到大门口，开门让他们进去。奥列佛决心冲上楼梯去叫醒这家人。塞克斯警觉到了这个孩子另有用心，便突然高叫“回来！回来！”这样，打破了深夜的寂静，室内的人立即闻声开枪。奥列佛中弹受伤，流着鲜血躺在沟里，塞克斯及其同伙连忙逃之夭夭。

第二天清晨，下着雨，奥列佛从昏迷中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泥沟里，左臂的衣服浸透了血。他是这样的虚弱和困乏，几乎连挣扎着坐起来也不可能。最后，总算爬了起来，蹒跚地走近一所似乎熟悉的屋子。奥列佛认出这是昨夜同塞克斯一起企图行窃的地方。他感到恐怖，一瞬间忘掉了伤口的剧痛，想返身逃走，但四肢无力，便瘫倒在地。女主人梅里夫人和她的养女萝斯小姐扶奥列佛进屋休息，并耐心地倾听奥列佛用微弱的声音叙述自己的悲惨遭遇，她们十分同情他，决定收留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

奥列佛受了枪伤，又加上着凉，连续发烧几个星期。在罗士朋医生和萝斯小姐的悉心护理下，奥列佛逐渐恢复了健康。之后，他和罗士朋医生坐了梅里夫人的马车一起去拜访布龙洛，可惜布龙洛的房子虽在，人却已经在六个星期前动身到西印度群岛去了。奥列佛只好失望地返回来了。从此，奥列佛和他的新朋友们过着愉快幸福的生活。一天，奥列佛正在一间小房间里打瞌睡，醒来发现法琴和另一个凶相毕露的人正在窗口看他。他大声呼救，两人迅速离去。那个凶相毕露的人后来才知道名叫蒙克斯。

贫民收容所里一个名叫赛累的老婆子快要死了。死前她对女管事科尔内太太忏悔自己的过错：“就在这个房间里，在这张床上，我曾经看护过一个很年轻的女人。她生了一个男孩之后就死了。……我抢掠了她，她还没有冷哪，我就偷了她身上惟一值钱的东西——那个金饰物。”接着，她拿出一张当票，要求替她赎回那个饰物，设法交给那个名叫奥列佛·退斯特的孩子。说完，老婆子就断了气。科尔内太太接过那老婆子交给她的当票，赎出了年轻女子的遗物，却把它吞没了。后来，科尔内太太和本布尔结了婚，成为本布尔太太。

管理员本布尔十分凶狠，婚后本想摆出男子汉的威风，不料本布尔太太是个出名的雌老虎，以致他经常挨打受骂，变成一个惧内的人。一天，他又在老婆那里受了气，便跨进酒店想借酒浇愁。在那里，他碰见一个陌生的年轻人，那人给了他两个金镑，要他回忆十二年前奥列佛出生时的情景，并追问看护孩子母亲的那个老婆子的下落。那陌生人一听

到老婆子已经死去，显出不知道是失望还是放心的样子。狡猾的本布尔马上看出这是可以利用他的太太所持有的那个秘密来获利的好机会，于是装出神秘的样子告诉陌生人，说有一个女人曾经在那个老婆子临死之前与老婆子密谈过。于是相约在次日晚上和那个女人商谈。临走时，陌生人告诉他自己名叫蒙克斯。

第二天傍晚，是一个闷热、阴暗的夏日雷雨之夜，三人来到约好的地点。蒙克斯以二十五英镑的代价，使本布尔太太交出老婆子死前托她赎出的奥列佛母亲的遗物——一只小金盒子，里面是两绺头发和一只没有镶嵌的金的订婚戒指，它反面刻着“爱格妮”三个字。

蒙克斯回到伦敦和法琴密谈，告诉法琴自己已经去奥列佛出生的收容所，设法买到了奥列佛母亲的遗物，而且已经把这个惟一能证明这个孩子身分的证物沉入河底。蒙克斯答应给法琴一笔巨额报酬，要法琴设法把奥列佛培养成不可救药的惯窃，坐遍全市监牢，并把他送上绞刑架。同情奥列佛的南茜偷听到了两人的密谈，便冒着生命危险设法把这个消息通知了萝斯小姐，并约定有事可以在每星期日深夜十一——十二点之间在伦敦桥找到她。

萝斯小姐对这个重要情报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奥列佛奔回来告诉她布龙洛已回伦敦寓所的消息。萝斯立即和他同往，把南茜讲的秘密告诉了布龙洛。布龙洛和梅里夫人、萝斯小姐等人商量决定，要尽一切努力设法找到蒙克斯，弄清奥列佛的身世。

下一个星期日深夜，南茜应约在伦敦桥会见了布龙洛和萝斯，把蒙克斯的外貌、性格和出入地点告诉了布龙洛。不料这次会见被法琴派来的人偷听到了。塞克斯得悉南茜出卖了他们，急忙赶回家去把南茜从床上拖起来，残酷地杀死了。次日清晨，塞克斯点火烧毁了凶器和沾满血迹的衣服，呼哨一声，招唤他豢养的狗，迅速离开了屋子。

布龙洛终于在街上找到了蒙克斯，把他带回家里。布龙洛叫出了蒙克斯的真名——爱多亚·李福。他告诉蒙克斯，自己是他父亲的亲密朋友，逼他说出奥列佛的出身和历史。

原来蒙克斯和奥列佛是同父异母兄弟。奥列佛的父亲爱德华和蒙克斯的母亲婚后感情不好，两人长期分居。在蒙克斯十一岁时，父亲隐瞒了已婚的真实情况，和一个退休海军军官的长女爱格妮相爱，订了婚，爱格妮有了身孕。后来，爱德华去罗马办事，出国前曾探望好友布龙洛，并托他保存一幅自己亲手画的未婚妻爱格妮的画像。爱德华到了罗马突然染重病。蒙克斯的母亲闻讯赶来罗马，处理丈夫的财产。爱德华死后，人们在他的写字台里发现一份遗嘱和一封给爱格妮的信。遗嘱讲明等他死后要把遗嘱和信寄给布龙洛。信中忏悔了他长久以来隐瞒了已婚的事实，要求爱格妮把订婚饰物金盒子和戒指带在胸口保存好。关于遗产的分配，遗嘱中说，由于他和前妻感情不好，儿子不务正业，品德恶劣，因此他们两人只能每人拿八百英镑年金；其余大部分财产则分成两份，一份给未婚妻爱格妮；另一份给将来她生下的孩子。遗嘱中又作了下述规定：假如爱格妮生下的孩子长大后，发生有辱门庭的不名誉亭扣下流行为，就不能继承遗产，而将这份财产移交前妻之子。蒙克斯的母亲烧毁了遗嘱，却留下信件以防万一。她临死前，才把这秘密告诉了蒙克斯，并要儿子为她复仇，不让爱格妮生下的孩子有好日子过。所以蒙克斯千

方百计寻访奥列佛的下落。得知奥列佛在贼窟之后，蒙克斯就勾结法琴要把奥列佛训练成小偷、惯窃。另一方面他又设法收买了本布尔太太保存的奥列佛母亲的遗物，把它销毁了。蒙克斯母亲生前为了对爱格妮进行报复，曾尽量夸大其辞地把爱格妮的私情告诉了爱格妮的父亲——那个退休海军军官。爱格妮的父亲觉得全家蒙受了耻辱，便带着两个女儿改名换姓迁居他乡，不久他就离开了人间。长女爱格妮临产前离家出走，在贫民收容所生下了奥列佛；次女就是被梅里夫人收养的养女萝斯小姐。

事情真相弄清了，善恶到头终有报。塞克斯在警察追捕下，爬上屋顶，企图用长绳吊到沟里逃生，不料准备套在腋下的绳索活结在匆忙中套住了头颈，脚底一落空，活活地吊死了。法琴也被捕入狱，判处绞刑。在行刑前夕，布龙洛和奥列佛到死牢里，迫令法琴说出了藏匿蒙克斯交给他保存的那封信的地点。奥列佛接受了遗产，在布龙洛的提议下，主动分一半遗产给蒙克斯，让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但秉性难移的蒙克斯去美洲花完了他的那份财产，故态复萌，又操起旧业，偷窃、抢劫，终于又被捕入狱，死在牢里。奥列佛被布龙洛收为养子，过着幸福的生活。萝斯小姐也和长期爱她的梅里夫人的儿子哈里结成美满姻缘，两人同梅里夫人住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奥列佛·退斯特》以揭露社会生活中的黑暗面著称。它通过孤儿奥列佛童年的悲惨遭遇，揭露了资产阶级慈善机关的虚伪性和残酷性。英国资产阶级把根据一八三四年颁布的新济贫法设立的贫民收容所，美化为“地上的天堂”。胡说这里是一个不要钱的客栈，免费供应饭菜的饭店，是穷人的游乐场所。狄更斯以具体的事实指出，贫民收容所实际上是人间的地狱。那里只是“无限制地供应清水”，“每天开三顿稀薄的粥，一个星期两次给每人一根葱，星期日有个面卷子”。贫民们在饥饿的折磨下，体重日益减轻，人数迅速减少，棺材店老板却生意兴隆。因此，狄更斯尖锐地讽刺说：“全部贫民都有在两者之间选择的权利：或是留在所里逐渐地饿死，或是出去很快地饿死。”小说猛烈地抨击贫民收容所把夫妇分开收容，造成妻离子散的荒谬规定。指出制订这种规定的目的是防止穷人国家负担太重而引起骚扰、闹事，要求救济，企图要他们忍受奴役不加反抗。狄更斯辛辣地讽刺和揭露了资产阶级慈善机关的欺骗性和狠毒性。

《奥列佛·退斯特》形象地展现了英国城市下层社会的悲惨景象。伦敦东头贫民窟的肮脏和丑恶，连从小在苦水中泡大的奥列佛也从来没有见过。街道是那样的拥挤、狭窄和泥泞；空气混浊，臭气冲天；店铺里陈列着最廉价的劣等食品；下等酒店里的男男女女喝醉了酒相互戏谑调笑；这里的房屋又矮又密，又黑又脏，伸向人行道上的屋檐摇摇欲坠，破败的墙壁在人走过的时候似乎震动得直晃，有些烟囱已经一半倒塌，……居住在这里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失业工人、孤儿、脚夫、流浪汉、乞丐和妓女们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受到资产阶级法律的迫害。当奥列佛被误当小偷受审时，警察局的官员不问是非曲直，一看到这个小孩衣衫褴褛就草率地判服苦役三个月；当奥列佛吓得昏倒在地时，这个官员还硬说他在故意佯死、耍花招。对于这种公然践踏贫民人权的行径，作者愤慨地斥责说：这是“专横地蹂躏女皇陛下的臣民的自由、荣誉、体面”。

以至生命”，其凄惨的程度“足以使天上的天使们哭瞎了眼睛”。这些话确切地说明了资产阶级法律保护富人、迫害贫民的阶级本质。

但是，狄更斯只写出社会丑恶的一些表现，而看不到产生这些罪恶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反而认为这只是社会的反常现象，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光明尾巴来解决矛盾。奥列佛后来受到好心肠的资产者布龙洛的搭救和抚养，一下子从贫苦的孤儿变成资产阶级的公子少爷。这样，小说前半部写了资产阶级统治者与下层贫民、孤儿的矛盾，可是在后半部，矛盾的性质变成了善良的资产者与凶恶的盗贼即流氓无产者之间的冲突。善良的资产者要拯救孤儿奥列佛，盗贼要迫害奥列佛，而统治阶级的法庭、警察也是站在孤儿一边，成为贫民、孤儿利益的保护者。作品里，法琴、塞克斯被描写得阴险可怕，丧失人性；而布龙洛、梅里夫人、罗斯小姐等有钱人和警察却是那么善良、仁慈，勇于为保护贫民、孤儿献出一切。最后，奥列佛和其他善心的资产者得到了好报，美满幸福；而给好人造成灾祸的盗贼尽管凶恶，还是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作者认为，虽然局部的法律条文如“新济贫法”有严重缺陷，但政府的法律总的来说还是伸张正义，为民除害的。这是狄更斯早期作品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乐观主义幻想。小说精心塑造了理想化的善心资产者布龙洛的形象。他对待奥列佛多么仁慈、关怀；他的座右铭是“恕人、互爱和感谢保佑人的上帝”；他伟大的德性是对一切人的“慈爱”，认为没有爱就没有幸福。这种抽象的“慈爱”观念，是作者头脑中的阶级调和思想在艺术上的反映。

《奥列佛·退斯特》艺术手法上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具体地、真实地描写了处于英国社会底层的人民的悲惨命运，写出伦敦盗贼的真实生活。在本书序言里，狄更斯明确指出：“在我看来，照实际存在着的样子来描写这样一群犯罪的人们，是十分必要的；在他们的一切缺点和一切不幸之中描写他们；在他们的生活的贫穷之中描写他们；如实地表现出他们在最污秽的生活之路上始终惴惴不安地潜行，最后，仍逃避不了被黑色的、怕人的绞刑架结束生命的命运。我认为这样做是需要的，是对社会有益的，因此我尽我的能力照这个样子去做了。”基于这种观点，作者反对当时流行的把盗贼生活诗意化、浪漫化的写法，而是真实、具体地写出了一些“贼”的日常生活；写出了伦敦阴冷、潮湿、污秽、紊乱的街道——藏污纳垢的场所；写出了盗贼凶恶的外貌，邪恶的心灵，堕落的生活，从而使小说真实可信，使那些生活于痛苦之中的小人物第一次出现于英国文学之中。

《奥列佛·退斯特》大量采用讽刺手法，因而揭露得深刻，嘲笑得有力。例如作品一方面写贫民收容所“不得不替所有的贫民改衣服，因为他们喝了一两个星期稀粥以后，衣服就都宽松松的在消瘦萎缩的身体上飘荡了”，而另一方面，棺材店的“帐目增加了”。这样的描写，讽刺了贫民收容所慢性死亡政策的“成功”，揭露了资产阶级慈善机构折磨贫民的残酷性。让我们再来看看奥列佛要求“添一点”而遭到迫害的那些段落。作者写道，不要“以为奥列佛在孤独的被禁闭期间是被剥夺了锻炼身体的利益、集体生活的愉快、或是宗教安慰的好处”。不，奥列佛天天在“锻炼身体”，享受着“集体生活的愉快”和“宗教安慰的好处”，这就是：在严寒的天气站在天井里用冷水冲洗，“本布尔先生

为了防止他受凉，就一再地使用他的藤杖”；“每隔一天带他到孩子们吃饭的地方鞭打示众”；让他听孩子们祈祷，而在对上帝的祷词中加上董事会塞进去的“知足”、“服从”和“不要沾染奥列佛的罪恶”的内容。这样的描写，相当幽默地讽刺了贫民收容所当局的虚伪性。

《奥列佛·退斯特》一反《匹克威克外传》结构松散的“流浪汉小说”的写法，而是集中描写主人公奥列佛的遭遇，使结构趋于严密，情节曲折，故事生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小说中某些惊险场面的描写（如塞克斯谋杀南茜；塞克斯为了逃避警察追捕，跳上屋顶而被长绳意外地吊死的情景等等），也增添了故事的生动性，使读者难以忘怀。

《大卫·科波菲尔》

狄更斯在《大卫·科波菲尔》（一译《大卫·考坡菲》，1850）的序言中写道：“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我最喜爱的是这一部。……像许多偏爱的父母一样，在我内心的最深处，我育一个最宠爱的孩子。他的名字就叫《大卫·科波菲尔》。”

《大卫·科波菲尔》确实是狄更斯整个创作中极为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世界文学名著之一。清朝末年，我国就有了林纾（琴南）的文言文译本，取名《块肉余生述》。之后，陆续出现了许天虹、董秋斯、林汉达、张谷若等人译出的多种全译本和节译本。根据小说改编的英国电视系列片《大卫·科波菲尔》在我国的放映，更使这部小说的影响遍及我国城乡。

一个初春之夜，日历告诉人们这一天是星期五。深夜十二点的钟声和呱呱坠地的婴儿啼哭声汇合在一起。遗腹子大卫·科波菲尔出生在英国萨福克郡的布伦得屯一所名叫“栖霞庐”的房子里。

大卫出生的那天下午，大卫母亲珂莱萝正坐在壁里炉前面，身体虚弱，精神萎靡，两眼含泪看着炉火。她对于自己，对于自己身体里即将坠地的无父孤儿，怀着不知是高兴还是失望的心情。忽然她看见一个不认识的女容，往庭院里走来。来客走路时挺直了腰板，绷紧了脸，没有一丝笑容；到了门口，她没有拉铃，而是来到大卫母亲住房的窗子那儿，把鼻子尖儿使劲贴在玻璃上往屋里瞧。按照大卫父亲生前经常谈起的情况，珂莱萝一下就知道这个陌生的女客就是性情孤僻的贝萃·特洛乌小姐。她是即将出世的大卫的姨婆。贝萃小姐进屋后，端详着珂莱萝的脸蛋，突然喊叫起来：“哟，我的乖乖！你简直还是个娃娃呀！”当她听到这所房子名叫“栖霞庐”时，又摇着头大叫起来：“我的老天爷，房子这儿连一只乌鸦的影子都没有，却给房子起名为‘栖霞庐’！”听见女佣人的名字叫“坡勾提”，贝萃小姐又有些气愤愤地把这个名字重复了一遍，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名字，野蛮人的名字。她由不得大卫母亲发言，硬说生下来的一定是女孩，而且打算做这个女孩的教母，并给孩子取名为贝萃·特洛乌·科波菲尔。可是当天晚上，当贝萃小姐听到医生说生下了一个男孩时，就失望地连看都不看一眼小大卫，撇下他们母子俩，气冲冲地走出大门，再也没有回来。

大卫在母亲和女佣人坡勾提的疼爱、抚养下过着快乐的童年生活。一天，坡勾提征得珂莱萝的同意，带大卫到渔港亚摩斯她哥哥坡勾提先生的家里去玩两个星期。他们乘马车来到海滩，没有看见什么房子，却看到一个黑漆漆的平底船放在地面上，上面伸出一个像漏斗似的铁玩意儿，原来这是烟囱，正缓缓地往外冒烟。幼小的大卫十分新奇，觉得住在这条船里，比住在《天方夜谭》中描写的阿拉丁的宫殿里还要迷人，更富有神话色彩。渔夫坡勾提先生一家就住在这条破船改建的小房子里。和他住在一起的，还有他收养的父母双亡的侄儿海穆和外甥女爱弥丽，以及朋友的寡妻格米治太太。小大卫和小爱弥丽两小无猜，在海滩上一块玩耍、谈笑、讲故事，愉快地度过了两星期难忘的海滨生活。

大卫和坡勾提回到家里，却不见母亲来接，心中不禁诧异。进去一看，原来母亲已经和一个绅士结了婚。这个以前曾经来他家作过客的黑

头发、黑胡子男子名叫摩德斯通，大卫认识他。现在他脸色铁青，命令大卫的母亲珂莱萝“沉住气，克制自己，永远要克制自己”。大卫母亲不敢对大卫表示亲热，只是畏畏缩缩地站起来对大卫吻了吻，在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又坐下作活儿去了。这使大卫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打击。为了霸占大卫家的财产，摩德斯通先生和他的妹妹摩德斯通小姐狼狈为奸，胁迫珂莱萝交出钥匙。珂莱萝不愿大权旁落，一再申述“咱们没结婚以前，我管家管得很不错。”但在摩德斯通姊弟的软硬兼施逼迫下，软弱的珂莱萝不得不忍气吞声，任人宰割。接着，摩德斯通又百般毒打小大卫。他使劲用手杖当鞭子抽打大卫，好像不把大卫打死就不肯罢休似的。性格倔强的大卫并没有屈服。他拚命反抗，狠狠地咬伤了摩德斯通的手。为了制服大卫，摩德斯通姊弟把大卫送进了伦敦一所恶棍克里古尔办的萨伦学堂。

这个学堂，实际上是个摧残儿童身心健康的地方。在那里，大卫受尽折磨。他的后背上被人挂上一块厚纸做的广告牌，上面写着：“留神，他咬人”，使同学们都避开他。校长克里古尔先生的脸是凶恶的，眼睛小而深陷，鼻子很小，下巴却又很大，哑嗓子；说起话来前额上那几条本来就粗的青筋显得更粗，使那副本来就凶的脸相更加怕人。这个校长本来是个贩卖啤酒花的商人，赔本后才来开学堂。他以鞭打学生为赏心乐事。在学生中间，他像魔鬼一样挥鞭舞杖，横冲直撞，毫不怜惜学生。他除了打人，别的一概不懂，连学校里最坏的学生们的知识都比他多一些。开学的第一天，他拿着手杖巡视教室，巡视一遍以后，绝大多数学生都挨了打。大卫也在与校长第一次见面时就被他拧了耳朵，直痛得他泪流满面，暗暗骂这个恶棍为“全无心肝的煞神”。

一天，大卫得到了他慈爱的妈妈被折磨致死的噩耗。他满怀悲痛回家奔丧。母亲的葬仪才结束，狠心的摩德斯通姊弟立即辞退了与大卫相依为命的女佣人坡勾提，这样，更增添了大卫的痛苦。为了安慰大卫，坡勾提又一次把他带到亚摩斯海港。大卫在那儿和爱弥丽度过了一段愉快的生活，并参加了坡勾提和马车夫巴奇斯的婚礼。坡勾提语重心长地对大卫说：“亲爱的大卫，不管是现在还是我年老以后，只要我活着，只要这个家是我的，我就无时无刻不盼着你来的。”大卫深为这位亲爱的老保姆的忠心、笃实所感动。大卫回家后，过着忧郁、孤独的生活，迫切希望离开这个死气沉沉的家去继续读书。但是，一天，摩德斯通把大卫叫到跟前说：“你上学也绝对得不到什么好处，你的前途就是到社会上自己去奋斗”。说完就把他交给一个商人，带往伦敦去了。

这样，刚满十岁的大卫，就进了伦敦一家出口公司当上了童工。这个专门为邮船装运葡萄酒和烈性酒买卖的出口公司，房屋陈旧，环境肮脏；地板和楼梯都腐烂了；地下室里，灰色大老鼠成群结队地奔跑、哄闹、吱吱地乱叫。大卫和其他童工一样，穿着褴褛的衣服，整天洗刷酒瓶，在装满酒的瓶子上贴商标，塞软木塞子，在软木塞上打烙印，然后把酒瓶装进桶里。饥寒交迫的生活，龌龊发臭的环境，单调乏味的工作，使大卫想成为学者的理想破灭了。

这期间，大卫寄宿在密考伯先生家里。密考伯先生是个穷途潦倒的小职员，他自称很有才能，满脑子发财计划，但无论做什么事总是失败，弄得负债累累，债主成群。但他天真、乐观、可笑。当听到债户骂他“强

盗”、“骗子”时，密考伯先生又伤心、又惭愧，有时悲愤得不能自制，竟拿起刮脸刀要往自己的脖子上抹。可是事后不到半小时，人们就看见他哼着小调，比原先更派头十足地走出门去。密考伯太太也是能屈能伸，和密考伯先生同甘共苦，毫无怨言。大卫同情这对落魄的好心人，常为他们出入当铺典卖破衣烂衫，换取食物。当密考伯全家因还不起债而被关进债务监狱后，大卫还经常去探望。后来密考伯一家出狱，离开了伦敦，大卫失去了相依为命、患难之交的朋友，便决心徒步逃离牢笼般的摩·格出口公司，去投奔路途遥远的、从未见过面的惟一的亲人姨婆贝萃小姐。

可是，厄运又降临了。大卫还未迈出伦敦，钱和箱子就被一个长腿青年抢走了。一路上，他只得变卖随身衣服来糊口；他又冷又饿，精疲力尽，头脑发晕，两脚磨出了血泡，还要提心吊胆害怕无业游民的毒打和勒索。经过七天的徒步奔波，他终于找到了姨婆。

当他出现在姨婆面前时，完全是一副小乞丐模样：头发乱蓬蓬的；帽子压扁了；衬衣和裤子，让汗渍、露水、青草、泥土沾得五颜六色！鞋底早已一块一块地脱落，鞋帮也都裂开。面色严厉，性情古怪，但心地善良的贝萃小姐，一看到眼前的外孙又黑又瘦，衣衫褴褛，心里有说不出的凄楚，立即让他洗澡换衣，并写信通知摩德斯通姊弟。

摩德斯通姊弟来到了贝萃小姐家里，客厅里气氛十分紧张。摩德斯通趾高气扬地骂大卫“阴沉、忤逆、凶暴、乖戾、执拗、倔强”，是个“专爱捣乱的糟孩子”，认为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他更坏的孩子。他声称要无条件地把大卫领回去，并威吓贝萃小姐如果袒护大卫，那他们将永远驱逐大卫，脱离父子关系。贝萃小姐出于义愤，痛斥摩德斯通姊弟的谰言，揭露了姊弟俩折磨大卫的母亲和虐待大卫的暴行，并坚定不移地宣布，她将做大卫的保护人，并对摩德斯通姊弟下了逐客令。从此，大卫苦尽甘来，改名特洛乌·科波菲尔，开始了新生活。

为了让大卫接受良好的教育，贝萃姨婆亲自陪大卫去坎特伯雷找好友威克菲尔律师。律师热情地介绍大卫进斯特朗博士的学校读书。并让大卫晚上寄宿在自己家里。姨婆临走时给了大卫三句赠言：“不论做什么事，都绝不要小气，绝不要虚假，绝不要残酷。”大卫对律师和姨婆的恩情感激不尽，表示决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由于大卫以前在学校里简直没学到什么知识，艰苦的童工生活更把这些少得可怜的知识忘得一干二净，考试时全回答不出来，只好安插在全校最低的一班里。但他勤奋好学，很快就赶上了其他同学，成为斯特朗博士学校的优秀生。斯特朗博士学校的校务安排得井井有条，教师循循善诱，尊重学生，启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使学生自觉维护学校的荣誉，都发愤读书。

十七岁那年，大卫毕业了。为了培养大卫的意志和独立工作能力，为了让他“开开眼界，动动脑筋”，姨婆让他独自一人作一次短途旅行。大卫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斯特朗博士，离开了朝夕相处的、被大卫称为“良师、密友”的威克菲尔律师的女儿艾妮斯。途中，大卫和七年前在萨伦学堂结识的好友史朵夫相逢。大卫应邀去史朵夫家住了一星期后，又一起乘车到亚摩斯海港旅行。

大卫和史朵夫刚走到海滩上坡勾提先生住的陆地船旁边，船里传出

一阵阵欢乐的笑声和掌声，原来是勤劳、纯朴的海穆和爱弥丽举行订婚仪式。海穆拉着爱弥丽的手，大声宣布了他和爱弥丽之间的真挚的爱情，爱弥丽也含羞地说出了内心的幸福。大卫满心欢喜地祝福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史朵夫表面上也热情地祝愿海穆“快活如意”，可是一转身就污蔑海穆是个很蠢的家伙，配不上爱弥丽这个迷人的小美人。

旅行结束后，大卫和姨婆相约去伦敦会面。姨婆为了让大卫成为一个心地善良、通情达理、幸福快乐的人，决定送大卫到斯本罗博士的律师事务所当见习生。为此，贝萃小姐付出了高达一千英镑的学费，还为大卫租了一套舒适的房间。在史朵夫的引诱下，刚开始独立生活的大卫，就在房间里喝得酩酊大醉，随后又去戏院胡闹，在那儿碰见了艾妮斯。事后大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到艾妮斯处忏悔。艾妮斯提醒大卫要提防“煞星”史朵夫。艾妮斯还告诉他，威克菲尔律师雇佣的书记乌利亚·希普，用狡猾阴险、无孔不入的手段抓住并利用威克菲尔先生的弱点，逐步控制和左右了威克菲尔先生，现在已步步高升，成为威克菲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甚至还企图霸占艾妮斯。大卫一向厌恶希普的谄媚卑顺，听了艾妮斯的诉说，忍不住激动地喊道：“什么？乌利亚？这个卑鄙下流、谄笑的家伙，蝇营狗苟地爬得那么高！”不久，希普来到大卫寓所，踌躇满志地对大卫说，他不仅能够和威克菲尔先生合伙开事务所，而且还能把艾妮斯称作“我的艾妮斯”。大卫听了更是气愤。

斯本罗律师对大卫的勤奋学习十分赞赏，认为大卫定能在法律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大卫也深深地敬爱斯本罗，经常出入他家。一天，在斯本罗博士家里，大卫遇见了刚从巴黎回来的斯本罗的女儿朵拉。大卫一见钟情，坠入情网。

史朵夫带来了坡勾提的丈夫巴奇斯病危的消息，大卫急忙回到亚摩斯，与这位忠厚的马车夫见了最后一面。十分意外的是，海穆突然伤心地带来了爱弥丽离家逃跑的消息和爱弥丽留下的一封信。信中说她已经跟史朵夫一起去国外。这消息如晴天霹雳，坡勾提先生痛苦地大叫：“我要去找我的外甥女儿。我要去找我的爱弥丽。”“我要走遍全世界，去找我的外甥女儿。”大卫听了也十分震惊，想不到自己一向崇拜的、长得潇洒、漂亮的老同学史朵夫，居然是个诱骗渔家姑娘的灵魂卑鄙龌龊的恶棍。为了爱弥丽的前途，大卫和坡勾提先生一起来到史朵夫的家里，要求史朵夫的母亲同意儿子娶爱弥丽为正式的“阔太太”，但史朵夫的母亲却认为这样的婚事“有辱门楣”，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并污蔑爱弥丽出身低贱，“没有教养，愚昧无知”。她非但不谴责儿子的卑劣行径，反而责怪爱弥丽把她儿子的“事业毁了”，“前途毁了”。她的骄横傲慢、令人难堪的态度，使坡勾提先生非常气愤，决心走遍天涯海角去寻找爱弥丽。

大卫和斯本罗博士的女儿朵拉心心相印，两人私订终身。正当大卫沉浸在爱情的欢乐之中，贝萃姨婆突然来到伦敦，告诉大卫自己已经彻底破产。大卫听了大吃一惊，不知所措，可是姨婆却泰然自若，对大卫说：“我们应该勇敢地应付失败，不要让失败吓住我们，……我们应该战胜不幸”，并具体提出了紧缩开支，战胜困难的措施。不久，威克菲尔来拜访姨婆，谈论她存放在他事务所的公债问题。随同威克菲尔一起前来的乌利亚·希普一再抢着讲话。希普一面装得很谦卑，说奉承话，

一面身子乱扭，扭得叫人无法忍受。姨婆指着希普说：“你这个人真该死！”“你要是一条鳝鱼，那你就像鳝鱼那样，老打拘挛好啦。但是如果你是个人，那你可得把胳膊腿儿控制一下，……你再这样又打拘挛，又抽风，就该把我闹得发疯了！”在姨婆毫不留情的斥责下，希普被迫离去。

有一次，大卫去看望艾妮斯的时候，遇到希普。希普竟露骨地对威克菲尔先生说：“我有一种野心，想叫艾妮斯成为我的艾妮斯。……我比别的人具有更大的权利。”威克菲尔律师再也不能忍受希普的折磨和摆布了，愤怒地痛骂这个折磨人的家伙是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他痛苦地说：“我在他面前，一步一步地把名誉和地位，平静和安宁，家庭和门户，全都放弃了。”可是希普仍然恬不知耻地说自己是威克菲尔全家的救星。

为了摆脱姨婆破产而带来的经济困难，大卫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了秘书。他学会了速记，并开始写作。他的作品很受欢迎，赞美之声不绝于耳，但他认为人家越称赞，自己更应虚心，才能获得成功。可是，大卫事业上的成功，却不能掩盖生活上的苦恼。大卫二十一岁时和朵拉结婚，婚后不久，发现娇生惯养的朵拉，既不会理财、管家，又胆小怕事，容不得批评，经常哭哭闹闹，仆人也乘机偷窃、欺骗。这使大卫体会到“夫妻之间最大的悬殊，莫过于性情不合，目的不同。”

一天，大卫·科波菲尔得到了爱弥丽回到伦敦的消息。原来史朵夫带着爱弥丽跑遍了欧洲，开始时十分宠爱她，后来玩腻了，就把她赏给自己的仆人利提摩，自己扬长而去。爱弥丽在绝望中逃了出去，在一个好心的渔家妇人的搭救和帮助下，回到了英国。大卫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坡勾提先生。他们终于在伦敦一所简陋的房子里找到了这个饱受折磨的姑娘。爱弥丽叫了一声舅舅就昏了过去，不省人事。坡勾提先生抱着慢慢醒来的爱弥丽，看了又看，吻了又吻，然后带着颤抖的声音对大卫说：“感谢我的天父，我的梦想已经成了事实！”

一天夜晚，密考伯先生突然来到伦敦，同大卫和大卫的同学特莱得律师会面；诉说他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而受雇于乌利亚·希普，参与了他陷害、欺骗威克菲尔律师的阴谋活动。现在他受不住良心的谴责，决心揭发希普的罪行。大卫、贝萃小姐、特莱得律师等人相约聚会在威克菲尔律师事务所。密考伯先生在众人的鼓励和支持下，拿出密信，愤怒地揭发了希普伪造证件、蓄意谋财的勾当。他列数希普的三大罪状：一、利用威克菲尔酒醉时签署单据，从托管金里提出一笔巨款，用来偿还他谎称的业务费用和亏空；二、希普在各种帐本和文件上，有计划地伪造威克菲尔的签名；三、诱逼威克菲尔签订契约，把他的事务所的股份出让，甚至把他家里的家具出让，以换取年金，并给威克菲尔开了一份完全捏造、十分吓人的欠款，随即又假冒威克菲尔的名义高利息借进款项。通过这些卑劣手段，使希普成为威克菲尔先生离不开的人物，而把威克菲尔律师弄得身败名裂。事实证明，贝萃小姐的公债也是希普假冒威克菲尔的签字卖掉而被希普侵吞的。

密考伯先生义正词严的揭发，激起了在座人们的公愤。在人证、物证面前，希普被迫认罪，交出侵吞的款项，受到了法律的惩处。贝萃小姐为了感谢密考伯先生，决定拿出一笔款子替他还债，并资助他全家同

坡勾提先生和爱弥丽一起移居澳大利亚。

大卫的妻子朵拉身染重病，离开了人间。大卫怀着悲痛的心情决定出国旅行。大卫动身前往欧洲大陆的前夕，坡勾提先生来找大卫，托他送一封信给海穆。原来爱弥丽接到了未婚夫海穆的信，深为海穆对自己忠贞不渝的爱情所感动。大卫决定亲自去亚摩斯送这封信。第二天，大卫到达海滩时，海水风浪大作，好像整个自然界都在翻转折腾，即将崩溃。一艘开往英国的西班牙船在亚摩斯海岸遇险沉没，它的桅杆上还攀着一个危于千钧一发的旅客。勇敢的海穆不顾个人安危，前往营救，不幸被海浪吞没。当人们捞起海穆的尸体时，船上那个旅客的尸体也冲到了岸边，原来他就是诱骗爱弥丽的花花公子史朵夫。

大卫送走密考伯一家和坡勾提、爱弥丽后，带着丧妻、失友的悲痛，孤零零地离开了祖国，漂泊在异国他乡。在欧洲旅行的三年时间里，大卫一直与艾妮斯通信。艾妮斯鼓励他从苦痛中吸取教益，经受磨练，振奋精神。大卫回想艾妮斯对自己的关怀和情谊，觉得她正是自己的良师、益友，悔恨自己过去坐失良机，没向她求爱。在这段时间里，大卫埋头写作，成了著名的作家。

一个寒冷的深秋晚上，大卫·科波菲尔回到了阔别三年的祖国。他急于向姨婆打听艾妮斯有没有意中人。姨婆用手托着下巴，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说：“我疑心她有一个心上人”，这促使大卫下定决心向艾妮斯说出自己的爱慕之情。真诚、美丽、温柔的艾妮斯也坦率地对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不爱你的时候！”并告诉他朵拉临终前曾请求艾妮斯代替她的位置。有情人终成眷属，大卫和艾妮斯这对情投意合的佳偶，终于结了婚。大卫事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生活上也愉快幸福。姨婆贝萃小姐、女佣人坡勾提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度过愉快的晚年。后来，密考伯成了米得培港的治安法官、当地的知名人士。坡勾提先生从海外回国，知道爱弥丽为了纪念海穆而至死不嫁，但是她在劳动和照顾别人中找到了安宁。好人都得到了皆大欢喜的结局，只有乌利亚·希普和助纣为虐的史朵夫的仆人利提摩成了狱中的两名囚犯。

小说通过大卫·科波菲尔这个形象，写出了正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困难的社会环境中，通过艰苦努力、个人奋斗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生活上的幸福。大卫集中体现了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和道德观念。

十九世纪上半叶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的“盛世”，不仅工人、农民身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广大小资产阶级也处于政治上受压抑、经济上受剥削的地位，生活毫无保障，随时都有失业、破产和挨饿的危险。狄更斯也没逃脱这种命运的摆布。他深深懂得要在困境中获得自主和成功，必须艰苦奋斗；要做到在逆境中不消沉，在顺境中不骄傲。在大卫·科波菲尔身上，狄更斯就赋予了他这种高尚的品德。

狄更斯用大卫·科波菲尔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艰苦奋斗获得成功的道路，来否定资产阶级通过损人利己、巧取豪夺的卑鄙手段攫取名利的道路，这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它的积极作用。但是狄更斯没有认识到下面一个问题：小资产者不断贫困化的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单靠个人奋斗、劳力工作并不能避免小资产者的贫困和破产。因此，狄更斯为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指出的成名成

家的道路，实际上是一种空想。

作者还突出大卫重视友情，讲求仁爱的品质。大卫童年时代的同学——富有的资产阶级少爷史朵夫，曾一度保护过大卫，大卫就一生尊重这种友情，把他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当这个纨绔子弟诱骗、玩弄、遗弃纯洁善良的姑娘爱弥丽以后，大卫一方面对这种卑鄙行径表示不满，另一方面仍然宽厚仁爱，友情至上，经常以回忆这个贵公子童年时代的豪爽、能干来冲淡对他的憎恶。甚至在史朵夫遇暴风雨而丧生以后，大卫对他的毁灭还深感哀痛和惋惜，把他的作恶单纯归咎于母亲的溺爱。大卫对贫困的下层平民满怀同情，感情笃实。密考伯先生怀才不遇，落魄江湖，大卫和密考伯夫妇却亲如一家；大卫和女仆坡勾提一家人之间平等互爱，情谊深厚，这些正是狄更斯民主主义思想的真实反映。

狄更斯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进步作家，他谴责大资产阶级和其他坏人勾心斗角、惟利是图、玩弄阴谋、压迫穷人；他同情和赞美劳动者、小资产者的勤劳、艰苦、朴实、正直，并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说教来教育坏人改恶从善，悔过自新。这种思想表现在人物塑造上，除了讴歌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以外，还塑造了另外一些理想的奉行利他主义原则的人物，来跟现实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人物相对照。利他主义的好人中既有富裕的大卫姨婆贝萃小姐，也有贫困的坡勾提兄妹。贝萃小姐是个好心肠的有产者。她买卖公债，向国内外市场投资，却同情并帮助有困难的不幸者（如孤苦无援的大卫；受人欺侮、疯疯癫癫的狄克先生；无力还债，穷困潦倒的密考伯先生）。她有钱时不以富贵压人；一旦破产，也能谋求自立，不怨天尤人。由于她心肠好，德行高，因此她的财产失而复得，富贵长寿。作者通过贝萃小姐的形象教育富人，要他们以贝萃小姐为榜样，讲仁慈，不残酷，以便受到穷人的尊敬。利他主义的好人中，穷人的代表是大卫家的女佣人坡勾提和她的哥哥坡勾提先生。他们既无门第，又没受过教育，却有着一颗纯洁美丽的心。坡勾提把自己的一生始终如一地献给大卫，痛苦时安慰他，困难时帮助他，遇到灾祸时保护他，这一切早已超过了仆人对主人的责任。渔夫坡勾提先生更是胸襟开阔、心地善良的人。他自己经济困难，打光棍，却收养了孤儿海穆、孤女爱弥丽和朋友的遗孀古米治太太。为了拯救被诱骗的爱弥丽，决心手执拐杖，走遍天涯定要把她找到。作者通过大卫的嘴赞美坡勾提先生：“如果说，我平生敬重过任何人，那我从心眼儿里爱慕、敬重的就是那个人”，“他那坚强的性格、侠义的肝胆、忠诚的仪表、斑白的头发”，就表明他是我的“至交良友”。狄更斯对劳动者的赞美，正是他民主主义思想的突出反映。但是狄更斯过分突出了这些人的忍让、宽厚、与世无争、以德报怨，使这些劳动者成为没有斗争性，没有阶级觉悟的老好人，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思想局限。坏人之中除了外表漂亮、内心卑劣、诱骗爱弥丽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者史朵夫外，作者集中勾勒了乌利亚·希普这个伪善者的形象。他玩弄阴谋，伪造证件和签名，不仅夺取了威克菲尔的财产，还企图占有威克菲尔的独养女儿艾妮斯；他对人点头哈腰，用以掩盖内心的奸诈、阴险；他利用密考伯先生的穷困，诱使他充当自己玩弄阴谋的工具。但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在密考伯先生的仗义揭发下，终于身败名裂，进入监狱当了囚犯。作者以希普这个形象告诫人们不要玩弄阴谋诡计，否则决不

会有好下场。但狄更斯对于这样的坏蛋仍然幻想用人性的感化使他吸取教训，改过自新，因此，在作品的最后，使他当上了一个“模范囚犯”。

《大卫·科波菲尔》还通过大卫的半生经历，揭露了英国教育制度的腐败，童工制度的残酷。大卫童年所进的萨伦学堂，是当时英国学校的真实写照。通过大卫当童工时饥寒交迫、受尽屈辱的遭遇，控诉了资本家利用儿童廉价劳动力进行剥削的真相，指责童工制度扼杀儿童才智，摧残少年身心，侵犯人权，不合人道。小说多方面地揭发了金钱对家庭和夫妻生活的破坏作用。摩德斯通为了侵吞则产而诱娶大卫的母亲，把她折磨致死。大卫的姨婆也有丈夫，但他挥霍成性，分居后还不断勒索钱财，造成姨婆的痛苦。利己主义的情欲和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使爱弥丽这个纯洁的姑娘得不到正常的婚姻生活，身心都受到摧残。狄更斯真实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关系对婚姻的危害，体现出他追求纯真的感情、鄙视金钱利益的进步思想。

《大卫·科波菲尔》在艺术上最大的特点是，作者亲切地、清晰地、抒情诗般地叙述、描写了生活，人们读作品仿佛是大卫在跟我们促膝谈心。这里没有《双城记》那样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也没有《巴黎圣母院》、《基度山伯爵》那样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它只是通过讲述日常琐事，使读者了解时代的风貌，认识作品中的人物，陶冶思想感情。

《大卫·科波菲尔》以刻画人物的多种多样性格著称。作者着重通过人物的容貌、言谈、动作、服装、习惯，以至某些怪癖来写出人物的不同身份和不同性格。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的性格的成长和发展过程，写得细腻、真实、亲切，这在一些以情节取胜的小说中是难以见到的。大卫姨婆贝萃小姐的个性特征非常突出。长期的独居生活，形成了她严峻、孤僻、自信和旁若无人的性格。她外表吓人，讲话尖利，但心地善良，不畏权势，正义感强。对于坏蛋乌利亚·希普，采用外卑内恶的手法。写他没有眉毛，没有睫毛，眼睛是红褐色的，身体从不站直，任何时候都是扭曲、蠕动；手又冷又湿，像青蛙一样令人厌恶，用外形丑恶的描写衬托他蛇蝎一样的狠毒心肠。其他如疯疯癫癫但又心地善良的狄克先生，贪婪、阴沉的摩德斯通，等等，也都是各有各的语言、习惯、神情和特性。

《双城记》

一八五九年问世的《双城记》，直接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表现了作者对待暴力革命的矛盾态度。无论从反映作家思想的发展，概括社会生活的广度、深度，还是从表现生活的艺术技巧来看，都是狄更斯后期创作中首屈一指的杰作。

《双城记》由三个独立而又互相交织的故事组成。这就是医生曼奈特仗义告发贵族迫害农民的暴行而被长期关进监狱受折磨的故事；侯爵后裔代尔那放弃爵位和财产，侨居英国自食其力的故事；革命者得伐石夫妇从事革命斗争的故事。整个小说分为三部，第一部“复活”，第二部“金线”，第三部“暴风雨的踪迹”。第一部第一章“时代”，可说是小说的“序幕”，概括地叙述了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法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第二章正式开始铺展情节。

一七七五年十一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由伦敦开往杜佛的一辆邮车，正慢慢地爬上肖特山坡。粘湿、寒冷的浓雾笼罩着整个山岗，雾的浓度几乎遮住了车灯的光亮，只能隐约看见几码之内的道路。阴冷的天气，泥泞的道路，沉重的邮件，已使得三匹马疲惫不堪，颠簸着时停时走。三个旅客跟在邮车旁边步履艰难地爬着山坡。邮车上的卫兵站在车后部的高位上警惕地注视着周围，并且用一只手接着他面前的军械箱。由于当时盗贼横行，明火执仗在大路上抢劫的事屡屡发生，使得旅客与旅客、旅客与卫兵之间相互猜疑，生怕遭到意外。经过一番挣扎，邮车终于到了山顶。卫兵打开了车门，让旅客进了车厢，准备下山。突然，马匹奔驰的声音传上山来。那卫兵扯大嗓门喝道：“谁？”“站住！我要开枪了！”马蹄声立即停止，浓雾里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这是去杜佛的邮车吗？我要找一位客人。”

“什么客人？”

“杰尔维·劳雷先生。”

旅客之一的劳雷走出车门，带着微微发颤的声音问道：“谁找我？……是裘利吗？”

“是的，劳雷先生。”

“什么事？”

“有封信送给你。”

于是，劳雷对卫兵说：“不必担心，我是台尔生银行的人。你一定知道伦敦的台尔生银行吧，我为业务上的事到巴黎去。”说着，他给了卫兵五个先令。得到卫兵允许后，劳雷接过裘利手中的信，借车灯的亮光阅读着：“在杜佛等候小姐。”劳雷读完信后对裘利说：“回去说我的答复是‘复活了’。”裘利狐疑不解地带着这个古怪的回话离开了。邮车又在浓雾笼罩中辘辘地继续前进。

第二天中午，邮车平安到达杜佛。劳雷住进了乔治旅店，等待同去法国的曼奈特小姐露茜。原来，曼奈特小姐是法国一个医生的孤女，小时候就由劳雷带到英国，受台尔生银行的监护。她一向以为自己父母双亡，这次是为了处理父亲的一笔小小的遗产而去法国。在旅店中，劳雷对这位妙龄少女说出了事实真相。她的父亲被关在巴士底狱达十八年之久，现已获释，但神经已不正常，现住在巴黎他从前的一個仆人家里。并告诉她，他自己就是去辨认她的父亲，并领他回到英国的。他要露茜同他一起设法恢复曼奈特医生的精神活力，找回他失去的安宁和幸福。

劳雷和曼奈特小姐来到巴黎圣安东尼区的一条狭窄而又弯弯曲曲的街道。这里简陋肮脏，空气中充满难闻的臭味，污秽、疾病、愚昧、饥饿笼罩着整个地区，人们衣冠褴褛，脸色憔悴。在街上，一桶酒打翻了，附近的人蜂拥着奔来。有些男人跪在地上，把双手合成漏斗型舀起酒来啜饮！另一些人用破陶器碎片在泥潭里舀饮；有的用女人的头巾浸入酒里，然后再把蘸着酒的头巾放进嘴里。街上的酒不但全被吸干，甚至泥土也连带着被刮去了一层。

开设在街旁的一个小酒店的老板得伐石先生，领着年老的劳雷先生和年轻的露茜姑娘走进一个破旧、阴暗的阁楼。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凳子上，弯着身子正在忙碌地缝着鞋子。他那凹陷而瘦削的脸，嵌着两只显得格外大的眼睛，他的身体已经干瘪而衰弱，长期的迫害使得他

痴呆失神，害怕光线，害怕人声。劳雷看着他那可怕的神态，说：“曼奈特先生，看看我。你一点也想不起从前的银行家，从前的贸易往来，从前的仆人，从前的事情了吗？”那痴呆的“鞋匠”听到这话，失手把鞋子掉在地上，呆呆地看着问话的人，又仔细地望着得伐石。一种似乎听懂了话的表情出现在他脸上，可是这种表情很快又暗淡下去了。他的眼睛带着忧郁的幻想察看着地面，终于长叹一声，拾起鞋子，继续低下头像幽灵似的工作起来。曼奈特小姐轻轻地走到“鞋匠”身旁，一只手放到他的胳膊上。他迟疑地看了看她的脸，怯生生地抚摸着她的金发，又把眼睛凑近她的头发打量着。

“一模一样，”他说，“这怎么可能呢？”

他伸手从自己的脖子上取下一条发黑的带子，带子头上拴着一小块叠着的布包，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来，拿出了几根长长的金黄色的头发。这是他妻子的头发。他被监禁时一直小心地保存着。他又把露茜的头发拿在手里，仔细地对比着，发现露茜那发亮的金发跟他珍藏着的头发一模一样。他的嘴唇蠕动了好几次才轻轻地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你吗？”随即又凄惨地摇摇头，“不，不，不，你太年轻。你叫什么名字？我的温柔的天使”，曼奈特小姐听到父亲变得柔和的声音，欣喜异常，立刻跪在他的面前，两手放在他的胸前，说：“噢，最最亲爱的，你的苦难就要过去，请你抚摸我，为我祝福。吻我，吻我吧！我特地来接你到英国去，去过和平、宁静的日子。”曼奈特医生偎依在女儿的怀里，把头靠在她的胸脯上，像个孩童一般安详地睡着了。得伐石和劳雷见“鞋匠”已开始恢复神智，便拿出事先带来的旅行衣服以及面包、酒肉和热咖啡送给曼奈特。曼奈特医生以一种习惯性的服从姿势，按照他们的要求吃完了他们给他的食物，穿戴上他们带给他的衣服，顺从地听任女儿挽着手臂，走下楼去。他显然把这里也当作曾经长久禁锢着他的那个牢房——巴士底狱北塔一百〇五号。他走出院子时；本能地改变了步态，好像正在等待面前的吊桥似的。在女儿的扶持下，他和劳雷先生一起登上早已准备好的马车，直奔边境。吃尽千辛万苦的老人开始“复活”了。

曼奈特医生在女儿的悉心照料下，慢慢地恢复了常态。他们居住在伦敦一所幽静的房子里。他的精于医道的好名声，他的“复活”故事，使许多病人慕名而来，所以，他的收入尽够他们的生活需要。

五年以后的一七八〇年，伦敦法院开庭审判一桩叛国案。台尔生银行的信使裘利好不容易挤进法庭，问身旁的人：“下一个是什么案件？”那人兴致勃勃地回答：“叛国案。犯人将被吊在囚车上绞得半死，然后放下来当着他自己的面用刀开膛，剝出他的肚肠来，让他看它们焚烧，然后砍掉他的头，再将他斩成四块。”他们的对话被法官的出庭和法庭里随之发生的骚动打断了。大家的兴致集中到了罪犯站立的地方。被两个法警带进来的被告，是一个年约二十五岁的年轻人，长相很美，面颊晒成棕色，眼睛乌黑，样子像一位年轻的绅士。他态度镇定地向法官鞠了一躬，安静地站着。他名叫查理·代尔那，被指控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往来英、法之间，充当法国间谍，把英国准备派到北美的兵力和其他军事情报泄露给敌国——法国。告密人巴尔塞出庭证明查理·代尔那早在英国和叛军（指美国独立军）初次交锋前几个星期，一七十五年十一

月一个星期五夜晚，和一个同谋者乘邮车到杜佛去，为了遮人耳目，途中下车，倒走十多英里到一个有军队驻扎的造船厂去收集情报。代尔那据理反驳，指出这是捏造、诬陷。证人劳雷也否认在一七七五年十一月曾和代尔那同乘一辆邮车去杜佛。代尔那的辩护律师史曲勒孚又进一步用代尔那和自己的助理律师卡尔登外貌相象的例子，指出告密人弄错了人，并揭发告密人巴尔塞本身就是政府雇佣的间谍，一个出卖别人的奸细，因为代尔那讲过同情美国独立军领导人华盛顿的话，他就伪造证词，蓄意陷害。这一番辩护词说得告密人哑口无言。法庭因找不出确凿的证据，不得不宣判代尔那“无罪释放”。在旁听席上的曼奈特父女和劳雷等都围住了代尔那，庆贺他死里逃生。

法庭审讯以后，代尔那、卡尔登、劳雷成了曼奈特医生家的常客。一天，劳雷、代尔那应邀来医生家做客。席间，代尔那偶然说到翻修著名监狱伦敦塔时，发现有一个秘密的地牢，墙上的每块砖上都有囚犯刻的怨言、祷词。在一块石头上发现有似乎已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刻的三个字母 DIG（挖掘）。经过挖掘，发现了一包纸灰。但究竟写的什么，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当代尔那讲到这里时，曼奈特医生突然惊跳起来，用手按着自己的头，脸色难看得吓人。这使大家十分惊骇，不过，很快地，曼奈特就恢复了常态，他借口“有一大滴雨水落下来而被吓了一跳”，把事情掩饰过去了。但劳雷看得出，医生在看代尔那脸的时候，那脸部表情现出了同在法庭上看代尔那时一样的奇异神情，猜测他的惊慌必有原因。

法国世袭大贵族厄弗里蒙特侯爵，是查理·代尔那的叔父。他衣着华丽，态度骄横傲慢，脸上有一种奸诈、残忍的神情。他早上喝巧克力茶的时候，需要四个强壮的男仆侍候：一个仆人捧着巧克力罐子送到贵人面前；第二个仆人用他带着的小小器皿调拌巧克力，使它产生泡沫；第三个送上餐巾；第四个把巧克力倒进老爷的嘴里。为了维护他的气派和崇高地位，他决不允许四个仆人中减少任何一个。夜里，老爷大多数时间都要出去赴宴。这位老爷对于一般的公事是一切听其自然，对于特殊的公事，则一切必须照着他的意思办理。聚集在老爷周围的，是一批不懂军事常识的陆军军官，不知舰艇为何物的海军将校，不懂政治的文官，厚颜无耻的教士，花言巧语的策士，能言善辩的哲学家等等“名流显贵”。每当宴会时，全体宾客穿着华丽，色彩缤纷，好像在开时装展览会。

一天，侯爵大人离开巴黎豪华的府第到乡间别墅去。他乘着马车像冲锋似的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把一个穷人加斯帕的孩子碾死在车轮下，可是这位侯爵却气势汹汹地对穷人说：“你们怎么不照管好自己的孩子？你们总是要挡路。谁知道你们是否碰伤了我的马？”说着他拿出一个钱袋，抛下一枚金币，其神情好像一位绅士偶然打破了一件平常的东西，只要赔几个钱就行了。他毫不在乎地继续驱车。马车刚刚走动，突然“当啷”一声，一枚金币飞进车内落在马车底板上，他那安闲的神情被扰乱了。

“停下！”侯爵老爷叫道。“勒住马！谁摔进来的？”“你们这些狗东西。我真想用车子滚过你们的头。要是我知道是哪个流氓扔的，就叫他在我的车轮下粉身碎骨。”他用轻蔑的眼光掠了一下周围的群众，

吩咐一声：“走！”

侯爵老爷穿过城市来到了乡村。这里的村庄一切都离不开一个“穷”字，旅店、马厩、酿酒坊、饭铺、水池……一切设备都是那样简陋、寒酸。很多人都衣衫褴褛、面带菜色。当侯爵的马车进村的时候，车轮压轴的链条上还吊着一个被侯爵骂为“窃贼”的穷人，幸亏这人在马车爬上山坡时，设法挣脱了铁链滚下山坡逃跑了。

侯爵老爷的别墅是一座厚实、宏伟的巨大建筑，房间里放着豪华的家具，以及有适合于一个奢侈时代的奢侈国度里的侯爵使用的一切奢侈品。来自英国的侯爵老爷的侄儿代尔那也来到别墅。侯爵和侄儿由于立场不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发生了争执。侯爵留恋祖先对周围贱民握有生杀予夺之权，抱怨现在许多贵族特权已经丧失。他咒骂宣扬自由、平等的流行哲学，宣称“压迫是唯一不朽的哲学”，决心不顾一切“要保持家族的尊严和安逸”。他的侄儿却不以为然地说，贵族的特权使“我们的姓氏比法国的任何姓氏都令人憎恨。”

“我却希望它如此，”侯爵气急败坏地说，“我要使这些狗服从鞭子，跟这座房子的寿命同样长久地服从”，说着他昂首仰望着坚固的屋顶。

“我们犯了过失。我要以仁慈待人，为人伸冤补过。”他侄儿坚定地说。

“我宁死也要保存我生活过来的制度。”侯爵斩钉截铁地说。他的侄儿也同样坚定地表示要抛弃自己的爵位和财产，改名换姓去国外过自食其力的生活。直到深夜，他们才结束了辩论，分头就寝。

第二天清晨，人们发现侯爵的心窝上插着一把尖刀，刀柄上有一张纸条，纸条上潦草地写着：“送他早进坟墓。雅克。”

查理·代尔那在英国已成为一个优秀的法文教师，并以他丰富的知识和优美的文笔把法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在伦敦已颇有声望。他经常出入曼奈特医生家里，深深地爱上了露茜。不久，这对侨居英国的法国情侣终于缔结了良缘。曼奈特医生知道代尔那就是使他不经审判就监禁十八年的那个侯爵的后代，但他以仁爱为怀，秘而不宣，衷心祝愿女儿、女婿婚后幸福。

得伐石先生的酒店，是以“雅克”为代号的地下革命者的聚会地点。得伐石太太独自坐在店里主持店务。她面前摆着一只碗，碗里放着许多破损的小钱币，手里总是在编结她的绒线织物。某天中午，两个风尘仆仆的男人走进店里，一个是得伐石先生，另一个是戴着蓝帽子的修路工人。他们坐下来吃了一些黑面包以后，走进了当初曼奈特医生做鞋子时住的阁楼，里面已有三个人等在那里。得伐石小心地关上门，压低了声音说：“雅克一号，雅克二号，雅克三号，这就是我雅克四号奉命找来的见证，他会把一切告诉你们。讲吧，雅克五号！”

修路工用他的蓝帽子揩了一下脸，说：“我第一次看见加斯帕大约在一年以前，他被吊在侯爵马车底下的车链子旁边，在马车上坡时跳下逃走了。刺死侯爵之后，他又无影无踪了。可是，他后来不幸被抓住。有一次，我在山坡上干活，看到六个士兵押着他上山，两臂绑得紧紧的，脸上流着血，粘满了尘土。他被关进山岩上的监狱里。村子里的人们都在低声议论，说他不至于被处死，因为已经有人向国王送了请愿书，说

明他因为自己的孩子被侯爵马车压死而发了疯。” 雅克一号打断了修路工的话，插嘴说，那个冒死递送请愿书的就是得伐石。修路工继续说下去：“后来，他们还是决定处死这个穷人，在村上水池边建造了一座四十英尺高的绞架，绞架顶上竖着一把刀，刀尖矗立。他被绞死在四十英尺高的绞架上，尸体也没收，就挂在水池旁。真是吓人。”

修路工讲完后，雅克一号说道：“我们应该把这些人记到名单上去，是吗？”

“对！记到要消灭的名单上去。” 得伐石回答。

“那座别墅和那全族的人？”

“对！把他们全部消灭！”

他们把决定要消灭的敌人告诉了得伐石太太，让她在编结绒线时，把这个名单“编织”到记忆中去，等革命成功后把他们消灭。

一天深夜，得伐石太太看到丈夫有点快快不乐。“今天晚上你累了，”她说。“有点累”，得伐石先生点点头，“这时间真长啊！”

“复仇要经过长时间的准备，这是规律。我们必须耐心等待。”

得伐石沉思地抬起头说：“地震吞没一个城市并不需要一个长时间。”

“那酿成一次地震需要多少时间？”

“大概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得伐石说。

“可是一旦爆发，它能把阻碍它的一切都捣得粉碎。在这以前，虽然看不见也听不到，但是它一直酝酿着；酝酿着，……。你应该记住这个。” 她的眼睛里发出闪光，在绒线织物上打了一个结，好象绞死了一个敌人似的。

“我告诉你”，得伐石太太同时伸出右手来加强语气，“它虽然要在路上走很多时间，可是它已经出发了，正在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它绝不会后退，决不会停止。我告诉你，它始终在前进着。看看周围，想想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和不满，想想雅克党人所诉说的日益增长的愤怒情绪。你以为它还能久远吗？”

“勇敢的妻啊，”得伐石低着头答道，他双手交叉在背后，好像一个驯服而专心的学生站在老师面前似的，“这一切我并不怀疑。可是，当它到来时，我们可能已经不在人间了。”

“即使那样，我们也要促进它的到来。” 他的太太答道，并用劲地挥了一下手，“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白费的。我真诚地相信我们会看到那胜利。但即使看不到，你只要给我个贵族和暴君的头颈，我也一定要——” 得伐石太太咬着牙，狠狠地又打了一个结。得伐石稍稍红着脸，他为自己一时信心不足而羞愧。接着他坚定地说：“亲爱的，我决心干下去。”

“好！不过你要克服你的弱点，在斗争对象明确，时机成熟时固然要加劲干，在环境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也得努力干。” 得伐石太太结束了忠告。他们双双入睡。

第二天中午，这位可敬的妇人坐在酒店的老位置上，勤奋地编结着绒线。她把所要清算的敌人的名字“编织”在记忆中，永远不会弄错。她的身旁放着一朵红玫瑰花，不时地看它一眼。突然，门口进来一个陌生人，她马上放下绒线，把那朵玫瑰花插在自己头上。在得伐石太太刚

拿起玫瑰花时，顾客们立刻停止了谈话，并且一个个地走了出去。有两个刚刚进来的男客，一看到得伐石太太头上的玫瑰花，也装作找朋友找不着的样子，退出了店门。那陌生人一着店里没有顾客，就去和得伐石太太搭讪。他故意用话诱骗得伐石太太讲出群众反对政府的言论。但得伐石太太若无其事地说：“我和我丈夫开这个酒店已经够忙的了，没有功夫去管别人的事。”原来这个人是混进圣安东尼区的奸细巴尔塞。正当巴尔塞无机可乘的时候，得伐石先生走了进来。巴尔塞连忙故意摸摸帽子对他行礼：“午安，雅克！”得伐石一听，连忙停步回答道，“你搞错了”，“我不叫雅克，我的名字是爱奈斯脱·得伐石”。那奸细又失望了，和得伐石聊了一会儿也得不到什么线索，只好悻悻离去。得伐石太太立即取下头上的红玫瑰，酒店又恢复了原来活跃热闹的景象。晚上，得伐石太太手里拿着活计，从这里走到那里，充当着革命思想的宣传员。得伐石先生望着妻子的背影，赞叹地说：“伟大的女人！倔强的女人！堂堂的女人！了不起的女人！”

一七八九年七月中旬，酝酿已久的法国革命爆发了。圣安东尼区的贫民们像波涛似的怒吼了，成千上万只持着枪、刀、斧、木棍、铁棒的手臂向空中挥舞着。这狂怒的人群的中心就在得伐石酒店。得伐石太太手拿一只斧头，腰间插着一支手枪和一把利刀。得伐石先生浑身被火药和汗水弄得龌龊不堪，他正在那里分发武器，发布命令。“紧跟着我，雅克三号”，“雅克一号和二号，你们赶快分头去带领这些爱国者。”得伐石高声喊道：“来吧！朋友们，爱国志士们！我们准备好了，向巴士底狱前进！”

大地在怒吼，巴黎在沸腾，警钟乱鸣，炮声震天，愤怒的人群涌向专制制度的象征——巴士底监狱。深深的壕沟，双重的吊桥，巨大的石墙，八座高楼，大炮，毛瑟枪，烟火，人海都在怒吼。得伐石率领爱国者发动猛攻，他站在发热的大炮旁边，高呼：“努力，同志们，大家努力！”得伐石太太也大声呼喊：“跟我来，妇女们！我们能和男人一样冲杀。”武装的妇女跟着她冲了上去。突然，一面白旗从堡垒里竖起来，一座吊桥放了下来。巴士底狱攻陷了。人们欢声雷动，冲进了牢房。“犯人！”“名册！”“秘密牢房！”“刑具！”人们抓住狱吏，胁迫他们立即带大家到各个秘密牢房去。得伐石亲自押着一个狱吏，命他带路到曾监禁过曼奈特医生的北楼一〇五号牢房去。在一〇五号牢房里，得伐石意外地得到医生在神智还正常时所写的一封控告侯爵的信。他把信收藏起来。

人们抓住了监狱长，押解他去受审判。当他被人击倒在地死去的时候，得伐石太太一只脚踩着他的脖子，一刀砍下了他的首级。

几天以后，得伐石带来了专制政权的财政大臣孚龙被抓住的好消息。圣安东尼区的穷苦人们一片欢腾，男男女女手执武器去找孚龙报仇。这个大臣曾公开对挨饿的人民说，你们尽可以吃草；革命爆发后他又假装去世，命人举行了盛大的殡葬仪式，然后隐居乡下。但他仍未逃脱革命人民的手掌。人们兴奋地叫喊着：“把孚龙的血给我！”“把孚龙的头给我！”“把孚龙的心给我！”“把孚龙撕成碎片，埋在泥里，让青草从他头上长出来。”人们用绳子绑着这个老无赖，他的嘴里塞满了青草。愤怒的群众终于把这个革命的敌人活活吊死。

巴士底狱的被攻陷，孚龙的被处决，使得伐石兴奋地对太太说：“亲爱的，它终于来到了！”

革命的烽火燃遍法兰西大地。多少贵族城堡被摧毁，多少王公显贵被处死。那个侯爵认为坚不可摧的别墅，也在烈火中化成灰烬。侯爵的总管盖白勒也被押到巴黎狱中听候审判。

伦敦的台尔生银行一时成了法国流亡贵族的麋集地和“新闻交换所”。一七九二年八月的一天，代尔那从即将赴巴黎料理银行业务的劳雷手里，接到一封自己的总管盖白勒的求援信。信中诉说他被平民逮捕关进了监狱，恳请厄弗里蒙特（即代尔那）侯爵为了上帝、正义、仁爱 and 荣誉，来巴黎搭救他。代尔那为自己的忠仆受难而良心不安，想到自己早已放弃贵族爵位和财产，又没有压迫和拘禁任何人，还命令总管免掉农民的一些租税。因此，为了阻止流血，他决心伸张正义，去了巴黎。深夜，他留下个条子给妻子和岳父，向他们说明非去法国不可的原因。

代尔那一踏上法国领土，就被当作逃亡贵族押送巴黎。一路上，群众“打倒逃亡者！”“该死的贵族！”“叛国贼！”的怒吼声不绝于耳。一到巴黎，他被得伐石当作囚犯秘密监禁在拉冯斯监狱中一个五步长、四步半阔的单身牢房里。

曼奈特父女看到代尔那的留条也马上赶到巴黎。因为医生是专制政权的受害者，受到爱国群众的爱戴，使他能设法让代尔那写了一张“安全无恙”的条子给妻子，露茜欣喜若狂，哀求前来监护的严峻的得伐石夫妇不要伤害她的丈夫。

一七九三年雅各宾党人执政，革命浪潮更加汹涌澎湃。国王路易十六以私通敌国罪被送上了断头台。首都成立了革命法庭，全国有四五万个革命委员会。被称为“吉洛丁姑娘”的断头机不停地砍掉贵族和嫌疑犯的头颅，囚犯们在烈日下被排队枪决，河里填满了尸体，革命者在大街上跳着“卡尔马诺”舞。这些使得露茜胆颤心惊，深怕丈夫有一天也会被送上断头台。

监禁了一年零三个月后，革命法庭终于开庭审讯代尔那了。法庭上，法官和陪审员都戴着插有羽毛的红色小帽和三色帽徽。检察官控告代尔那触犯了“禁止逃亡分子回国，违者一律处死”的法令，应处以死刑。代尔那申辩自己不能算逃亡分子，因为在革命前就自动放弃了贵族爵位和财产，并居住在英国，自食其力地过活；声称这次回国是要搭救自己的总管的生命。曼奈特医生证实了代尔那的辩护词，代尔那即被无罪释放。劳雷、曼奈特父女同代尔那热烈拥抱，祝贺他恢复自由。就在全家欢庆代尔那出狱的当天晚上，楼梯上传来了陌生的脚步声，敲门声。四个头戴红帽子的爱国者，佩着短刀和手枪，走进屋来重新逮捕了代尔那。

次日，革命法庭重新审判，代尔那被指控是共和国的敌人，贵族，曾用特权迫害平民的暴虐者，依法应处死刑。法庭宣告告发人是得伐石夫妇和曼奈特医生。曼奈特一听面色苍白，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审判长，我愤怒地对你抗议，这是伪造的谎言。谁说我告发我女儿的丈夫？”审判长坚定地说：“曼奈特公民，冷静一点，假如共和国需要你牺牲你的女儿，你也必须义不容辞地牺牲她。别作声，耐心听下去。”得伐石出庭作证，诉说医生不经审判被监禁十八年的故事，并述说在攻占巴士底狱时发现的曼奈特医生所写的对厄弗里蒙特侯爵及其全族的控诉书。

法官立即命人宣读：

“我，亚历山大·曼奈特，一个不幸的医生。于一七六七年的最后一月，在巴士底狱内我的阴森森的牢房中写着这伤心的材料。我是万分艰难地偷空写它的。我打算把它密藏在烟囱里，在那里我已挖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当我和我的哀愁都化为烟尘的时候，或许会有一只悲悯的手在那儿发现它。这些字是我被幽禁的第十年的最后一月中，用一枚生锈的铁钉，蘸着烟囱里刮下来的烟灰，混合着鲜血写成的。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的一个有云的月夜，我正在塞纳河畔一个僻静的地方散步，突然有一辆马车很快地从我后面驶来。里面跳出两个好像是孪生兄弟的年轻绅士，他们问明我是曼奈特医生后，不由分说地把我拉上车，驶进乡间的一所别墅。在楼上一个房间里，床上躺着一个发着高烧，约摸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女子。她头发蓬松散乱，双手被绑着。我注意到这些绑带都是从一个绅士的衣服上撕下来的，上面有贵族的纹章和一个E字，（厄弗里蒙特，Evrémonde的第一个字母）。我注视着她的脸，她的眼神狂野，不停地发出刺耳的尖叫。‘我的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弟弟！’接着她从一个数到十二，又发出‘嘘’的声音，过一会儿，又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些话。我费了很大的劲，好不容易才使病人把我给她的丸药吞了下去。她稍稍安静以后，那两个孪生兄弟又把我带到马厩上面的一个阁楼。一堆干草上躺着一个农家少年，最多不过十七八岁。他仰卧着，咬紧牙关，右手按着胸口的剑伤。我一眼就看出他即将死去。

“‘这是怎么造成的，先生？’我问。

“‘一只发疯的贱狗！一个农奴！他迫使我的兄弟拔剑相向，从而倒在我兄弟的剑下。’这答话毫无怜悯、人道或仁爱之情。那垂死的少年望着我说：‘医生，这些贵族掠夺我们，凌辱我们，鞭打我们，杀戮我们。你见到了她吗？她是我的姊姊，婚后不久就被这些贵族兄弟抢去，新婚的姊夫也被逼死。当我把姊姊被抢的消息带回家里时，我的父亲心碎而死。我把我的妹妹送到这些贵族的权力达不到的地方之后，就跟踪他们来到这里。昨天夜里，我手拿尖刀跳进囚禁姊姊的房间。这贵族公子起初拿几个钱给我，后来又用鞭子抽我，我奋力反抗，在格斗中不幸被刺重伤。’这少年睁大眼睛，举起右手，表示总有一天要向侯爵算帐的决心。说完气绝身死。那个被奸污的女子也气息奄奄，活了不久就去世了。侯爵兄弟拿了一袋金币给我，要我保守秘密，我拒绝接受金币。回家后为了解除良心上的重负，我写信给朝廷揭发了这事情。不料信落到侯爵手里，我就不经审判被关进这活埋人的坟墓中来。当此一七六七年的最后一夜，我这个不胜悲痛的不幸的囚犯，谨向上天和人世告发他们，在这种种事情都有人作主的时候控告他们，控告他们的后裔，直到这罪恶家族的最后代。”

读完了这份材料，法庭上响起了一陈可怕的声音。人们狂热地欢呼曼奈特医生大义灭亲的爱国热忱。全体法官一致同意，宣判贵族、共和国的敌人、人民的压迫者侯爵厄弗里蒙特——代尔那死刑，于二十四小时内执行。

曼奈特父女听到判决，悲痛欲绝，快快回家。露茜的好友、面貌酷似代尔那的律师卡尔登，这时也在巴黎，他闻讯前来看望。露茜的小女儿一看到他就跳上去抱住大叫：“亲爱的卡尔登，快设法帮助妈妈，把

爸爸救出来吧！你是爱她的人，你能忍心看着她这样吗？”卡尔登俯身把这女孩子红扑扑的脸庞贴在自己脸上，并弯下身子吻了一下失去知觉的露茜。

卡尔登忧郁地走进得伐石的小酒店，听到得伐石太太和人商量要把代尔那一族人全部消灭的计划。原来得伐石太太就是医生的控告信中所说的那个被送走的小妹妹，那个死在贵族手里的少年是她的哥哥，被贵族迫害致死的女人是她的姊姊。现在，她决心复仇，彻底消灭侯爵全族。卡尔登找到劳雷，诉说曼奈特全家随时有被捕丧命的危险，因为共和国的法律规定：同情、哀悼上断头台的犯人的，也要判处死刑，而曼奈特一家毫无疑问会犯此罪。卡尔登说自己有办法把代尔那救出来。他嘱咐劳雷马上准备马车，明天迅速同医生全家离开法国，并把自己的证件交给劳雷。他要劳雷替他保留一个座位，说只要发现这个座位上有人，就必须马上动身。

阴暗的牢房中，代尔那写完了给妻子、岳父的遗书，正躺在麦杆床上度过有生之日的最后一夜。午夜一点多钟，门外的石头过道里传来了脚步声，原来是卡尔登。卡尔登为了让自己所爱而不能被爱的露茜和她全家的幸福，买通了密探和狱卒，并在牢房中迅速和代尔那交换了衣服穿戴，利用他和代尔那外貌的相象，决心代替情敌登上断头台。代尔那带着律师卡尔登的护照登上了劳雷早已准备好的马车，和妻子、女儿、岳父直奔边境，终于平安地返回伦敦。

得伐石太太决心消灭代尔那的一家。为了防止他们得讯逃走，她要亲自去医生住处监视。她和一些革命妇女约好，在代尔那的囚车到达断头台的时候回到现场观看。得伐石太太怀中带着一支实弹的手枪，腰间插着一把锋利的短剑，来到医生的住处，只见房间里十分凌乱，好像匆匆忙忙地整理过行装。她连忙追问露茜的女仆普鲁斯小姐：“厄弗里蒙特的妻子在哪里？”普鲁斯只懂英语，而得伐石太太只会讲法语，她们因语言阻隔而发生争吵。在互相扭打中，普鲁斯触到了得伐石太太的手枪扳机，一阵火光和爆炸声，得伐石太太当即中弹身亡，普鲁斯小姐的耳朵也被震聋，匆匆逃走。

六辆囚车载着五十二个囚犯来到刑场。卡尔登作为第二十三名囚犯厄弗里蒙特从容地登上了断头台。

《双城记》写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最后一年。这时，狄更斯思想和创作已进入成熟阶段。他感受到英国社会中贫富悬殊、劳资对立的严重性；看到贵族、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使工人、贫民和广大农民的生活过不下去，群众不满、怨愤的情绪日益加剧；觉得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改良、纠正，很可能逼使人民铤而走险，发生暴动，引起像法国一七八九年那样的武装革命。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使他不满意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同情人民的苦难生活，但是他更害怕暴力革命。因此，他创作了小说《双城记》，具体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来警告英国统治阶层，要他们从中吸取教训，进行改良，缓和矛盾，防止革命的发生。

小说最主要的价值，在于揭露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阶级矛盾的尖锐性和革命的必然性。

在十八世纪后期的法国，人民处于极端贫困无权的境地，城市里到

处是饥饿和疾病，人们衣衫褴褛，面容憔悴；农村里更是一片凄凉，农民被国家税、教会税、贵族地主的租税、地方税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摆在农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不是在饥寒交迫中倒毙在小村里，就是被拘禁和死在监狱里。在政治上，一般人民被称为“贱民”，毫无人权保障，他们饱受地主贵族的欺凌和迫害。小说中所描写的厄弗里蒙特侯爵，就是一贯欺压平民的贵族代表。他的生活豪华奢侈，性格傲慢狡诈，手段狠毒残酷。你看，他的马车任意辗死穷人的孩子；私设绞架随便处死无辜良民；仗势霸占农家妇女；肆意迫害曼奈特医生，……他还用“压迫是唯一不朽的哲学”之类专横的理论来论证剥削有理，压迫有功。他的滥施淫威，造成了与农民的极度对立，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作品在揭露地主贵族专横暴虐，描写人民悲惨遭遇的同时，还热情地写出了人民奋起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被侯爵马车辗死的小孩的父亲，愤怒地掷回侯爵抛下的金币；雅各党人深夜刺死侯爵，为民除害；特别是作品直接反映了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爆发后，巴黎人民冲向专制制度的反动堡垒——巴士底狱的暴风骤雨般的革命行动；人们欢声雷动，手执武器，高呼口号，跨过壕沟，冲上吊桥的锐不可挡的气势和威力。

小说还通过革命者得伐石夫妇的形象，进一步肯定了革命的必然性、正义性。得伐石夫妇是巴黎圣安东尼贫民区雅克党的革命领导人。他们坚定、勇敢、富有领导艺术，特别是得伐石太太，更是有勇有谋，机智灵活，目光远大，意志坚定。在丈夫担心革命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不会来到时，她却真诚地相信会看见革命胜利的，并强调爱国者要用自己的行动促成革命的到来，在攻占巴士底狱时，她和男人一样勇猛，率领妇女猛打猛攻，决不后退；她仇视贵族，要求除恶务尽，不留后患。作者热情地赞扬她是“了不起的女人”。

在这部小说里，狄更斯不仅把人民的贫穷苦难的根源归之于封建剥削制度，而且肯定了法国革命的必然性、正义性；也赞同在暴政压迫下的群众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和行动；欣赏革命者的智慧、胆略和革命行动，这是他世界观中正确思想的反映。但狄更斯不同意人民用暴力革命，特别是对雅各宾党人坚决镇压贵族的恐怖手段十分反感。因此，作品中对革命后的巴黎的描写有不少是歪曲的。他埋怨革命行动“流血太多”、“太残酷”，不仅误杀了一批善良的贵族，而且连一些无辜平民也惨遭杀害。他把革命法庭的审判员写成“好杀成性的”、“杀人不怕血腥的、吃人的妖魔”似的形象，把所有憎恨贵族的群众，都说成是“最野蛮的人戴着野蛮的面具”，把以前赞扬的“了不起的女人”得伐石太太，描写成一个冷酷、凶狠、嗜血成性的女魔王，故意让她莫名其妙地死去。

狄更斯在法国革命前谴责封建贵族的暴行，是出于人道主义思想；革命后指责革命者的“不人道”，污蔑爱国平民是“新的压迫者”，也是出于人道主义思想。不仅如此，他还在作品里直接宣扬人道主义理想，即用宽恕、仁爱、阶级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和暴力行动，宣扬剥削者放弃剥削，自食其力，鼓吹以德报怨、爱敌人的人类之爱。这种思想，主要反映在两个人物身上，一是贵族青年代尔那，一是小资产阶级青年卡尔登。

代尔那虽然出身名门贵族，却是个背叛自己阶级的进步人物。在作

者笔下，代尔那不仅外貌英俊，而且心地善良，忠于友情，见义勇为，临危不惧。通过这个人物，作者给剥削者树立了榜样，要他们向代尔那学习，象代尔那那样放弃剥削，进行道德修养，自食其力，从而缓和阶级矛盾，防止革命。卡尔登则是一个借酒浇愁、没有理想、自己也说自己没有出息的小资产阶级青年。他曾爱过代尔那的妻子露茜，当他得知代尔那被判死刑，露茜极端痛苦时，为了使自己所爱过的女人及其全家幸福，为了获得道德上的满足，就设法代替情敌上了断头台。作者用卡尔登自我牺牲的“博爱”精神与革命的“恐怖”相对照，用卡尔登的“仁慈”和革命群众的“残酷”相对照，进一步宣扬了以德报怨的人类博爱思想。狄更斯作品中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正是作者人道主义思想的反映。这种思想在相当程度上也突出地反映了英国中、小资产阶级作家对革命的矛盾态度，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双城记》在艺术手法上也别具匠心，有着许多跟狄更斯以前写的小说不同的特色。

结构巧妙，构思严密，情节生动、紧张。狄更斯以前的小说，如《匹克威克外传》、《奥列佛·退斯特》、《大卫·科波菲尔》等，大多顺着主人公的成长或事件发生的先后述说故事，描写事件，有的还插入许多小故事，结构显得松散，不严密，情节缺乏波澜起伏。《双城记》却不同，它把三个主要故事发生的地点放在巴黎、伦敦两城，以台尔生银行职员劳雷作为联系双城的桥梁。小说的描述并不以事件发生的先后为顺序，在“序幕”之后，先写曼奈特医生出狱后的“复活”。他为什么坐牢，他和得伐石夫妇的关系，他和厄弗里蒙特侯爵叔侄的关系，他和劳雷的关系，都是通过以后的倒叙、插话和其他人的追述逐步揭示出来的。特别是作者把最关键的情节——医生在狱中写的控告侯爵罪行的材料，放在小说即将结束之前，即革命法庭第二次审讯代尔那时才公布出来。这样一公布，整个小说中的各种人物关系、矛盾纠葛都清清楚楚地连结了起来。为女婿说情乞命的曼奈特医生，竟成为置女婿于死地的控告者；而露茜所选择的丈夫，恰恰是迫害她父亲的仇人之子；得伐石太太原来就是侯爵所杀害的农家仅存的后代；医生为什么坐牢十八年的谜底也揭晓了，情节至此达到高潮。这部小说极富戏剧性，常常奇峰突起，出人意料。例如，正当代尔那被判二十四小时内执行死刑的当晚，却出现了卡尔登的替死，造成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全副武装去监视露茜一家行踪的得伐石太太，却意外地被误触扳机，中弹死亡。这样的情节结构，和一般开门见山、平铺直叙的结构大不相同，使小说引人入胜，富有艺术感染力。

对比手法的巧妙运用。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场景描绘等方面，都运用了对比手法，使之相互衬托、对照，更突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愿望。老一代侯爵厄弗里蒙特的专横暴虐、残酷掠夺，年轻一代侯爵查理·代尔那的仁慈、人道、放弃剥削，两者道路不同，结局不同，反映了作者对前者的憎恶，对后者的赞美。露茜突破了个人恩怨，消除相互仇恨，用温情主义的“金线”把父亲与丈夫这两个本来有着仇恨的人串联起来。以露茜一家在英国和睦、宁静的幸福生活与革命后法国的动荡、混乱的现实相对照，突出作者对暴力革命的厌恶，对相互谅解的温情主义的推崇。卡尔登为情敌登上断头台的“博爱”精神，与革命者

用暴力杀害无辜良民的“残酷”相对照，进一步突出作者人道主义的思想要求。这样的对比手法，使作品主题突出、形象鲜明、生动有力。

《双城记》在风格上改变了以往小说的天真观、诙谐幽默，代之以严肃、悲愤的批判，反映了作者思想的成熟，观察的敏锐，现实主义力量的增强，但也流露出对社会前途的忧郁和失望情绪。

独特的艺术手法

狄更斯是一位具有高度艺术才能的小说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十八世纪以来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优良传统，创造了独特的艺术手法，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狄更斯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主要不是从人物的内心世界来刻画性格，而是从描写人物的外部肖像、服饰、装束、举止、风度、使用的语言和生活的环境着手，善于抓住人物身上的某些特征、人物说话的语言特点和行为举止上的癖性、习气，采用漫画的笔调，夸张的手法加以强调，使人物形象鲜明，性格突出，有的人物甚至只要开口讲几句话，做一个动作，就能做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一看到那个和蔼可亲、天真可爱的胖绅士，他的圆眼镜、白背心和紧身裤子，他那圆圆的肚子，他那逍遥自在翘起在背后的上衣尾巴，以及堂吉诃德式的爱打抱不平，见义勇为，人们就会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匹克威克先生。一谈到那个讲起话来咬文嚼字，写起信来堆砌词藻，债户登门时想自杀，债主一走又把皮鞋擦得锃亮，把衬衫领头烫得笔挺，走路神气十足的人物，读者立刻就知道这是穷愁潦倒而又天真乐观、充满幻想的密考伯先生。对于那些奸诈、残忍的人物，狄更斯往往抓住他们身上某些令人厌恶的习惯、癖好或生理上的特点加以夸张，以激起读者的憎恨情绪。在刻画乌利亚·希普这个卑鄙、奸诈的伪君子形象时，特别抓住他嘴里讲“卑贱”，说奉承话，身子扭得象鳝鱼一样这个动作和双手又粘又湿这个特点加以讽刺性描写，讲他翻书以后，“二拇指在书上留下一道又粘又湿的印儿，好像真有蜗牛爬过一样。”看了这些描写，很自然地就会激起人们对这个形象的厌恶和痛恨，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这种手法正表明狄更斯比别人看得远，观察得深，看到并写出一一般人看不到、写不出的人物性格特征。

狄更斯是一个善于运用诙谐、幽默手法而闻名的作家。他的幽默既不同于果戈理的措辞尖刻的讽刺挖苦，也不同于马克·吐温的犀利而又轻松的冷嘲，而是哀而不伤，戏而不谑。他惯于用喜剧性的俏皮笔法，把社会上一些不合理、不道德而又司空见惯的事物和现象从地上举起来，使它显得荒唐可笑地飘浮在半空中，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它使读者在笑声中觉得这种事物和现象不能再存在下去，以迫使统治阶级纠正这些偏向。因此，狄更斯的诙谐、幽默决不是像某些西方资产阶级评论家所讲的那样，只不过是纯粹使人笑笑，逗人玩玩，而是寓教于乐，寓愤怒于俏皮、风趣之中。他通过幽默、诙谐的艺术手法，可以使处于深重苦难中的人们冲淡对生活的怀疑和绝望，抚慰心灵上的哀伤和创痛，从笑声中得到一点娱乐。但更重要的是，作者使人们在笑声中发现愚蠢和荒唐，激发对虚伪、邪恶事物的憎恶，对善良、忠厚和一切美好事物的爱慕，以达到教育人民，改造、整顿社会弊病的目的。大法官庭在英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腐败、黑暗虽然也引起有识之士的不满，但并没有使人产生深恶痛绝的感情，不少人对它的丑恶面貌还认识不清。狄更斯在《荒凉山庄》中，把大法官庭一件案子审了几十年，弄得当事人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的昏庸腐朽的面貌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使人感到荒唐可笑，从而惊醒、气愤，觉得这种腐败、过时的司法机构非彻

底抛弃不可。之后，英国统治集团慑于人民的威力，不得不取消了大法官庭这种腐朽、没落的封建残余机构。

作者对于本性善良、行为可笑的人物，一般爱用善意的温和的幽默手法，在嘲笑、揶揄中又饱含同情。例如密考伯先生，作者用幽默的手法写他一会儿呜咽哽噎，搜肠抖肺，悲痛得要自杀，时隔不久又快乐地唱起流行歌曲；他高谈阔论又脱离实际；他一生都在等待“奇迹”却又老是穷困潦倒；他无力还债身陷债务监狱，却又成为囚犯俱乐部的“伟大权威”。在这个人物身上那些浮夸、脱离实际、崇尚空想、明明贫困而又想保持绅士气派等不良习气，看了令人哑然失笑，却又饱含同情之泪。对于作者厌恶的人物，则用讽刺挖苦、丑化的手法。在《老古玩店》中，狄更斯出于对高利贷者奎尔普的痛恨，写他外形上是一个怪诞、可怖、丑陋的小矮子，内心更是毒如蛇蝎。他常常别出心裁地装鬼脸吓唬老婆，使她几次昏死过去，而他却得意洋洋；他的仆人在干完一件事后，得到的报酬经常是被木棍狠狠地敲一下鼻梁，弄得酸痛难熬，眼泪直淌，奎尔普却引以为乐。当他知道和他合伙陷害好人罪行的律师布拉斯招供以后，他顿生歹念，阴谋把布拉斯推到河里淹死。作者讽刺地描写了他的这个恶毒主意：“啊！看看他浮起三次，在他的面孔露出水面一大口一大口喝水的时候，嘲笑他一番，那该是多么有趣的事啊！”奎尔普这种外丑内恶的形象，令人一看就感到厌恶，留下难忘的邪恶印象。

狄更斯的小说在艺术上还具有戏剧化的传奇冒险情节；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形式；催人流泪、感人心肺的悲怆，感伤情调；现实主义方法中的浪漫主义色彩；语言通俗，想象丰富，故事性强等等特点。这些都构成了狄更斯小说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狄更斯的作品广泛而深刻地描绘了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的矛盾和时代风貌，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怒，受到革命导师马克思的高度赞扬。马克思把他和萨克雷（1811—1863）、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一起，称为“现代英国的一派出邑的小说家”，讲他们以“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多”。狄更斯被英国人民赞为“穷人的诗人”，认为他的一生都在为受欺压的人们伸张正义，为受苦的贫民争取美好的生存条件；称颂他的作品“使压迫者害怕，使受压迫者有了希望”，“受到鼓舞”。狄更斯的创作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奠定了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对整个欧洲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我国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著名翻译家林纾（琴南）就用文言文译出狄更斯的作品，如《块肉余生述》（《大卫·科波菲尔》）、《贼史》（《奥列佛·退斯特》）、《孝女耐儿传》（《老古玩店》）、《滑稽外史》（《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冰雪姻缘》（《董贝父子》）等等。接着，伍光建用白话文译出《艰难时世》，谢颂羔译出《三灵》（《圣诞欢歌》）。之后，狄更斯的小说有更多、更好的译本陆续问世，流传深广。

由于狄更斯的小说大多数先在杂志上分期连载，最后再编集成书，每个部分之间既有联系又能相对独立，类似我国民间的说书，故事生动，情节吸引人，有头有尾；在人物塑造上也特别重视人物的动作和外貌的

描绘，形象鲜明突出，很像我国古典章回小说，适合于我国读者的口味，因此一直受到热烈欢迎。解放以来，外国根据狄更斯小说改编的电影《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奥列佛·退斯特》）、《孤星血泪》（《伟大的期望》）和电视系列片《大卫·科波菲尔》、《老古玩店》等先后在我国放映，更使狄更斯名闻全国，他的作品各种译本也遍及城乡，成为我国人民极为宝贵的精神食粮。

